

理论与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1958
1-6

1
1958

目录

發刊詞..... (1)

“关于社会科学問題”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核心 杜国庠 (3)

粉碎右派分子对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猖狂进攻.....王致远 (9)

批判修正主义，保衛馬克思列宁主义 楊奎章 (13)

为和平事業貢獻一切力量.....楊榮国 (18)

进一步提高教育質量.....阮鏡清 (19)

科学工作必須依靠党的領導.....容 庚 (20)

讓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的基础上前进吧！.....刘 渠 (21)

党領導下的人民教育事業必然要由胜利走向更大

的胜利.....鄒有华 (23)

積極改造自己，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李稚甫 (24)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胜利完成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孟 光 (25)

批判董每戡的“三国演义試論” 饒芃子、黃天驥、吳文輝 (27)

事物、認識与表达 (墨家認識論的片断) 杜守素 (33)

“智”与“愚” 于燕郊 (35)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广东工人对国民党右派的

斗争 (資料) 金应熙 (36)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

灣地区的斗争 (調查报告) (41)

动态

广州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文化遺址又有發現

广东科学工作委員會成立

規模宏大的广东科学館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中

满怀信心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笔談)
欢呼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地超額完成，

發刊詞

广东地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久以来就有开辟一个学术研究和活动园地的愿望。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这就是现在和读者见面的这个“理论与实践”的创刊。

我们把这个综合性的学术期刊定名为“理论与实践”，这就表明我们决心使本刊在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力求紧密地联系我国和广东地区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力求反映当前学术上的重大问题，并通过对这些学术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正确地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是相当长期存在的，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思想上，将特别尖锐地反映出来。这是因为一定的意识形态必然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缘故。我们广东地区的情况说明，学术界这种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早已存在；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虽然由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伟大胜利，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理论”不敢再那么猖獗了，但这还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理论”远没有彻底“缴械”。而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意见，则根本没有正面“交锋”。我们要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阵地，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还必须在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对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理论”进行不断的、深刻的、系统的批判，充分地展开学术观点上的自由讨论，并在斗争和讨论的过程中，正确地、不懈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广东地区学术界的这种情况，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密切联系实际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从实际出发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也就是本刊的主要任务。

广东是我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影响最深的地区，这一历史条件，使广东地区在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研究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广东地区的人民，在抗英、抗法的斗争中，都写下了光辉的史页。广东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较早，又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是在这里誓师的，规模最大、为期最长的罢工斗争——省港大罢工就是在这里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深广影响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在这个地区的海陆丰发生的。广东地区毗邻港澳，通达南洋，在那里居住着近千万同胞和侨胞，他们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生活，都是同祖国人民血肉相关的。广东地区的海南岛和粤北，杂居着黎、瑶、苗等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民族起源、社会经济制度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的研究，都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所有这些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形成我们广东地区学术界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问题、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问题、港澳和南洋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方面的丰富材料。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学术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着鲜明的地



方特色，也具有全国性的学术价值。我們决心努力使本刊的内容既具有地方的特色，又是面向全国。我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作为一个地方的学术性讀物，它应该在具有全国性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来保持鮮明的地方特色。因此，我們强调本刊的地方特色，不但不排斥对于一般性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探討，而且力求貫徹执行党和国家对于学术研究的方針政策和要求，使本刊成为我国整个繁荣的学术园地的一角。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进我国科学發展的方針，是促进社会主义学术繁荣的方針，也是本刊的編輯方針。

我們認為，一定的学术观点，必然反映一定的階級思想，而不同的学术观点上的爭論，也就在實質上反映了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爭。但这仍然是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我們知道，思想上的斗爭，特别是学术思想上的斗爭，就其性質來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指示我們：“思想斗爭同其他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怎样正确运用这种細致的講理的方法呢？那就是要展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爭論。在学术思想問題上，就是要展开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討論。所以，我們希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們，抛开一切不必要的顧慮，坦然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所有要求进步的学术工作者，都希望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家，那就更有必要通过学术問題上的自由討論，以便及时克服那些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这也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有效的道路。为了繁荣和發展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工作，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决定以相当的篇幅，發表有关的学术論著和科学研究資料，所以，我們还希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們，在这方面給予我們大力的支持。

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討論，学术讀物上發表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会不会引起讀者的思想混乱？会不会削弱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界的領導地位？我們認為，这是不会的。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学术問題上的自由討論，才有可能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界的領導地位。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愈是通过对立观点的爭論，愈是能揭露出非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謬誤所在，愈是能显示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穷威力。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發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与一切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爭中發展起来并夺得胜利地位的。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沒有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方式的学术上的爭論，这一方面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也就得不到充分的揭發和正确的解决，社会主义学术的繁荣和發展，就会受到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必須坚持貫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道理。当然，我們坚持这一方針，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为了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而不是为了恢复資產階級的“学术”，有利于資本主义在我国的复辟；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重提一次毛主席关于辨別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一）有利于團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專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領導，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領導；（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團結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團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團結。这也就是我們在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必須遵循的标准。

我們愿意用我們的努力來貫徹本刊既定的方針和任务，愿意用我們的辛勤來为广大讀者和作者服务，以期在社会主义科学事業中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同时，我們也热切地期待着广大讀者和作者給我們以支持、監督和批評。

“关于社会科学問題” 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核心

杜国庠

科学工作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科学事業的繁榮，沒有科学研究的成就，要建設一个以高度發展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事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已經在原来的非常可憐的基础上大踏步前进，不少在反动統治窒息下深感“无用武之地”的科学家，正在積極地为偉大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新的科学力量正在空前迅速地成長和壯大；党和政府發展科学的远景規劃的制訂，“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的提出，鼓舞着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們，他們满怀信心地要使我国重要科学部門在十二年內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面对着这样一个美丽的远景，这样一条寬广的科学發展的道路，自然抑止不住心头的喜悅，不遺余力地来从事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所迫切需要的科学研究工作。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科学界的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配合着整个資產階級右派的攻勢，在科学領域进行了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集中地表现在由章罗联盟所策划的、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名义提出和發表的所謂“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我們从不否認，在我們的一日千里發展着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和錯誤。我国的科学事業，既然不是緩慢地而是大踏步地發展着，在飞躍前进的道路中，难免要碰到許多困难和問題，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正因为如此，党、政府和科学工作領導机关才經常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鼓励科学家們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以期群策群力，克服缺点，解決問題，改进工作。党中央关于开展整風运动的決定、特別是“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更无疑必將有利于科学机关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科学的进一步繁榮和發展。事实証明，凡是善意地提出批評和建議的科学家的意見，都得到采納，即使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得到考虑和解釋。可是，对于那些目的在破坏和削弱党的領導，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事業的惡意攻击和陰謀活动，那就必須給予徹底的揭露和无情的反击。正是因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洋溢着对党对社会主义事業的仇恨，充滿着危言聳听的惡毒挑撥的字眼以及明目張胆的复辟資本主义的政治陰謀，才引起全国人民首先是科学家們的同声痛斥。这是連主持起草这个“綱領”的右派分子曾昭倫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搞的“的的确确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另一个主持起草这个“綱領”的右派分子錢偉長也吞吞吐吐地承認：这个“綱領”抹煞了党这几年来对科学工作的帮助和發展，仇視了党对

科学领导的政策；挑撥党和科学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科学家正需要改造的时候；企圖夺取党对知識分子的领导权。

就科学工作領域來說，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是相当全面和系統的；其中“关于社会科学問題”部分，是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們的政治陰謀表現得最露骨的部分。因为在这一部分中，他們公然提出“恢复”资产階級社会科学的口号。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一“綱領”不过是右派集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方面；他們的整个的政治陰謀，是要使資本主义复辟。因此，他們必然企圖摧毁作为我們国家生活的指导思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资产階級思想意識杀开一条血路，以便在思想陣地上建立資本主义复辟的桥头堡。他們都懂得，作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总是为一定的經濟基础服务的。这样，反复地給予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关于社会科学問題”部分的徹底駁斥，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科学是一个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的科学部門。这已經不是什么深奥的學問，而是一种普通常識了。不能說，资产階級的社会科学家們連这一点普通常識也沒有，他們之所以故意睜着眼睛說瞎話，那只是因為他們有着“難言之隱”而已。因为資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既然是一种少数占有生产資料的资产階級剝削和压迫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制度，既然是按照社会的發展規律，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灭亡而为沒有剝削沒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那么，为资产階級服务的社会科学，如果承認了社会科学的階級性，豈不就等于承認自己是在为少数的资产階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动統治服务了嗎？豈不就等于承認自己的學說必將随着資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无所依附了嗎？这种“難言之隱”正是一切资产階級學者所以千方百計地隱瞞社会科学的階級性的原因。

馬克思主义者公开地闡明社会科学的階級性，明确地宣称自己的學說是为工人階級服务的。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全部官場与自由派的科学都是这样或那样来辯护雇佣奴隶制度，而馬克思主义却对这个奴隶制度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因为在建筑于階級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

然而，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的“关于社会科学問題”，却把资产階級的社会科学說成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用場、取消不得的宝贝，并且，教訓我們“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呢？据說，资产階級社会科学是有它的科学性的，因此，“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怎么办呢？据說，对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視的就应重視起来。”

我們对资产階級的社会科学，即旧的社会学、經濟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我們持什么态度呢？那就是：从原則上加以否定。这个态度是馬克思主义的还是教条主义的呢？我們認為，是馬克思主义的。过去对资产階級社会科学批判和否定得不徹底、不坚决，現在必須徹底批判，坚决否定。

从资产階級社会科学的階級性的分析，可以肯定，资产階級社会科学是不可能具有任何真正科学性的。这是因为它不能不受着那个剝削階級的不光采的階級利益的限制。这种情况，特別表現在資本主义已經进入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这个阶段，资产階級社会科学的任务，一方面集中于对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另一方面則不惜用謊言来自我陶醉和欺騙人民。当资产階級的社会科学家墮落成这样的說謊家和騙子手的时候，他們的學說的反科学性就更暴露无遺了。那么，正是在这个时期販运到中国来的旧社会科学，自然就連什么科学性的影子也沒有了。我国的旧社会科学，就它的實質来

說，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相結合的畸形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对于这样的所謂社会科学，还侈言什么科学性呢。

中国的旧社会科学家，在講台上，在著作里都談到国家問題。但没有誰敢于接触到国家的实质問題。而如果不承认国家是阶级統治的工具这一客观真理，如果不承认蔣介石的“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联合專政，难道能够科学地解决中国的政治問題，社会問題，經濟問題等等嗎？假如我們再看看“著名”的中国社会学家的費孝通的自白，就更能看穿中国旧社会科学的反动面目。費孝通在他所著的“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中提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时特別声明：“我这种說法完全是站在地主階層的生存兴趣上立論的”。这不是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虛伪的反封建性也唱变了調么？

有人認為，早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因此，这个“从原則上加以否定”的态度还值得研究。

·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否定历史的文化遺產，包括資本主义这一历史时期。而“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也科学地闡明这种批判的繼承关系。但是，如果因此認為應該从原則上肯定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就大錯特錯了。

就社会科学領域來說，我們所指的这个“原則”，就是为誰服务的問題。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使是早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原則上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不从原則上加以否定，就談不到批判的繼承和利用的問題。

我們可以从列宁在解釋和發展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中举出两个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个例子：在解釋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濟学的形成的时候，列宁承認，劳动价值論的始基，是由古典政治經濟学家亞当·斯密

和达維德·李嘉圖在考察經濟制度时就奠定了的。但是，“凡资产阶级經濟学家看見物与物間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換商品），馬克思則揭發出人与人間的关系。”正是这种对人与人間的关系的考察，使馬克思發現了商品的秘密——“工人用他的一部分工作時間来抵償維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費用（工資），而用另一部分工作時間去作无報酬的劳动，为資本家創造剩余价值，即利潤的泉源，資本家阶级財富的泉源。”

劳动价值論虽然在李嘉圖手中达到了资产阶级古典經濟学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峰，但他却始終不能提出劳动二重性的学說，不能揭露出价值这个經濟范畴所体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間的生产关系。無疑的，李嘉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他那还有着重大缺陷的劳动价值論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是会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战斗的，在打击地主阶级这一方面，他显得尤其卖力，但基于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他决不可能在劳动价值論的基础上去探究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這個問題。可是馬克思在接受由亞当·斯密和达維德·李嘉圖所奠定的劳动价值論的始基时，却批判了它的这种不徹底性，并从而提出了剩余价值論，而剩余价值論正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主要基石，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論武器。这里，它們之間的原則区别不是明显的么。在政治經濟学理論上的这种批判的繼承，我們認為正是在从原則上加以否定的前提下的繼承和利用。

第二个例子：关于馬克思的阶级学說的問題。列宁写道：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点是阶级斗争。人們时常这样說着，这样写着。但这是不正确的。而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見解，往往就对馬克思主义作出机会主义的曲解，把馬克思主义伪造为资产阶级所可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资产阶级所可接受的。誰仅仅承認阶级斗争，那

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是沒有离开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①

从“只承認階級鬥爭”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不也是存在着原則的區別嗎？難道我們能够这样說，因为馬克思主义也講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的學說又是資產階級創造的，就認為这是从原則上肯定了資產階級的社会學理論么？

这里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綫，那就是列寧在批判旧社会学、經濟學观点时所指明的：

“馬克思关于社会經濟形态發展底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根本摧毀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理的。……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各种部門中划分出經濟部門，从所有一切关系中划分出生產关系，当作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始初关系。”^②这就“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确定了社会經濟形态是一定生產关系总和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發展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③而在这以前的所謂社会科学，“至多也只是这些現象的記載，生硬材料的收集。”^④

这是社会科学上的革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家，虽然他們也进行社会調查，也收集材料，但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們总是象列寧所說的那样，难于把紛繁复杂的社会現象网中的主要現象和次要現象分別清楚，不能找到实行这种划分的客觀准繩。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思想一經形成，即把社会經濟形态看作是一定生產关系的总和，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这才“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⑤。

这里还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以上的例子，指的都是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早期的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当馬克思列寧主义用自己的科学性揭示了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弱点，并成为資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工

人階級的斗争武器的时候，如上面已經提到的，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就成为徹頭徹尾的造謠和說謊，成为垂死的資本主义社会的強心剂。因此，結論必然是：从原則上否定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態度是不能改变，不能动摇的。

从原則上加以否定，当然就不是什么“改造”的問題了。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提出所謂“改造”的問題，只不过因為他們也懂得，全国人民都承認：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而不是資本主义。因此，當他們企圖“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时候，就不得不多少弄一些換湯不換藥的所謂“改造”的遮眼法。当然，这种遮眼法是騙不了人，也掩飾不了他們的“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陰謀。因此，一下子就被識破了。

由此可見，“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中提出的“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問題，并不只是学术界的問題，而是右派集团企圖使資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整个政治陰謀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三

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关于社会科学問題”部分，並沒有停止在“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反动口号上，它还要求使他們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实际相联系”。这就是說，要求用資產階級的社会学、經濟学、政治学、教育学的思想，来制訂和指导我們国家的“政策措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对解放以来，我們国家各个方面的方針政策和重要措施进行了歪曲和攻击。所謂“法学專家”的右派分子王造时和所謂“經濟学專家”的右派分子陈振汉就曾分別为这个“綱領”作了注

① 列寧，“国家与革命”（“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第189頁）。

②③④ 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一卷，第96頁、第98頁）。

⑤ 同上（第100頁）。

脚：“許多問題不是憑常識，更不是憑教條能解決的。……不但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在社會科學方面（例如政治學，包括行政學、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如何延攬我們的老成學者（按：即資產階級“學者”）委託他們切實聯繫各部門的實際，研究並提供方案，以備採納。”（王造時）“業務部門能夠主動的從本身工作中提出一些有關方針政策的理論原則問題，交給經濟科學工作者去研究，或者在方針政策的決定和實施之前，征詢他們的意見，讓他們參預討論。”（陳振漢）原來如此。這裡，他們已經把右派集團的政治陰謀，招供得明明白白了。

關於我國解放以來的政策措施的問題，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家們唱的都是一个調子：一方面捏造說：“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見：“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另一方面污蔑說：“由於我們沒有能夠掌握或根本不知道應當有客觀經濟規律，我們的財經政策和措施……並未遵循什麼經濟規律，也不知道有什麼規律可資遵循，靠經驗辦事。”（見：“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意見”^①）這是要給共產黨“換班”的叫囂，不是什麼對科學工作的“意見”。

有必要首先揭穿起草這個“綱領”的右派先生們的策略。我們什麼時候曾“把政策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從來沒有。我們認為，我們的政策法令和根據這些政策法令所採取的措施，是依據客觀規律來制定和採取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社會主義經濟產生並日益壯大發展的現實經濟條件的基礎上，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領導，在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象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化這樣重大的政策措​​施，只要是稍為懂得一點經濟科學的人，誰都知道這是以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規律為依據的；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關於實現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這個任務的措施中，又規定發展工業

要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方針，這個方針的制定，完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再生產的理論為其科學基礎的。實踐結果證明，我們勝利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成功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這難道不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和重大措施時，正確的以客觀經濟規律為依據的鮮明例證嗎？我們還可以舉出黨和政府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例。黨和政府是根據什麼來制定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的呢？首先，我們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他們屬於哪個階級，視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哪個階級服務而定；其次，我們認為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有其重要性；第三，我們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有所區別；第四，我們認為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願意和可以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第五，我們認為黨有骨幹和有能力的領導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根據這種認識，黨和政府制定了“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並採取各種具體措施來貫徹這一政策。難道這種認識不符合客觀規律嗎？難道根據這種認識制定的政策不是正確的反映了客觀規律嗎？解放以來在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工作上的巨大成績，足以回答這個問題。自稱為“大知識分子”的右派先生們自然看到這一點，（不然，他們為什麼這樣急于“企圖奪取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呢？）他們之所以要捏造說我們“把政策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只是為了無中生有地指責我們“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外一個偏向”而已。這是一種極端卑污的“栽贓”的策略。

①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意見”是右派分子陳振漢糾合了徐毓楷、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等密談之後，由他執筆寫出的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綱領。這個意見書，正是章羅聯盟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在經濟學方面的具體化。

不可否認，有一些政策法令确实有不正确，不尽完善的缺点，但那只是个别的、暫時的情况。国家的重要政策法令，事实証明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正确性的最大保証，正是因為我們是以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那么，右派先生們为什么說我們的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是不科学的呢？原来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才称得上是“科学”，而馬克思列宁主义則是“教条”，是應該“摒弃”的“敝屣”。陈振汉不是就說过“馬克思的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保其每字每句都是珠玉呢？”的鬼話，而雷海宗不是也說过“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的謬言么？

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和学术界的右派分子所以要这样不遺余力地攻击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正是企圖在“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进而以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思想来指导和制定国家的政策措施；按他們的如意算盤，到那时，資產階級思想自然就代替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資本主义制度自然就代替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学术問題还是复辟資本主义的問題，至此就不言而喻了。

四

自然，我們坚持从原則上否定資產階級

社会科学的态度，并不等于不要所有过去研究旧社会科学的人。这些資產階級的社会科学家，他們都或多或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积累了一定的材料，只要他們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積極进行思想改造，在改变了他們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之后，他們一样可以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作出貢獻。解放以来，事实上也已經有一些旧社会科学家經過了“脫胎換骨”而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們是受到党和政府的愛护和重視的；有更多的旧社会科学家，正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自覺地进行思想改造，他們也是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幫助的。但是，我們不能容忍一小撮死抱着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腐尸不放，坚决要用这个腐尸發散出来的毒素破坏社会主义事業，从而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的冒牌的“科学家”，對他們的一切言論和陰謀活动，必須給予徹底的批判和堅決的打击。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东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争而發展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只有徹底揭露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虛偽性和反动性，徹底打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政治陰謀，才能进一步巩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障地，捍衛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事業，这是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无可旁貸的重要任务。

粉碎右派分子对我国人民民主 法制的猖狂进攻

王致远

在整風运动中，广东地区右派分子和北京、上海等地右派分子相呼应，对我国人民民主法制进行猖狂的进攻。他们攻击我国“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恶毒地诬蔑共产党“无法无天”、“肃反违法”，并叫嚷要恢复旧法和旧法学。这些謬言濫調是资产阶级右派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因为他们知道，人民民主法制是实施人民民主專政、保障社会主义事業的强有力武器，是他们陰謀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絆脚石。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首先要进攻人民民主法制，为他们的陰謀活动开辟道路。为了捍衛人民民主法制，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我們必須对右派分子这些謬言謬論，反复予以駁斥。

右派分子对我国人民民主法制进攻的第一支毒箭，是攻击我国“无法可依”。他们诬蔑說：“新中国沒有一項完备的單行法規可以遵循。国民党的法律虽然是惡法，也胜过共产党的无法无天，无法依据”；“国家沒有法制，宪法是空洞的，沒有保障，领导干部講什么就是法律”；“现在許多問題是靠政策办事的，不是靠法律”。

我国是不是“无法可依”呢？讓我們先看看事实吧，事实是最雄辯的。远在解放前，共产党在根据地即对法制工作十分重視，当时党和政府除頒布許多綱領、決議、决定、指示、布告外，还制訂、公布了許多單行条例和法規，如中华苏維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違反劳动法令懲罰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地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糾紛处理原則、旧債处理原則、农业稅暂行条例、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貨物稅暂行条例、保障人权財產条例以及司法程序、民刑案件調解条例、

監所保外服役办法等等。这些反映当时根据地人民意志，为人民所拥护的綱領、決議、决定、指示、布告、單行条例和法規等等，都成为当时根据地、解放区党和政府进行工作的法律依据。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更重視法制工作。解放之初，即制訂、公布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而当恢复时期結束，建設时期开始时，党和政府即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經過全民的討論，制訂和頒布了我們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他各种單行法規，也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制訂公布。根据国务院法制局公布的材料，我国解放以来，共已制訂和公布了四千零一十八件法規，其中包括工会法、劳动保險条例、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綱要、选举法、婚姻法、兵役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貪污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重要的法律规范。这些法規的制訂和公布施行，对保障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对巩固人民民主專政，維持社会秩序；对保护国家与人民利益、教育人民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为人民所拥护，得到国际上的贊揚，这是人所共見的事实。

当然，从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來說，我国人民民主法制，还是不够完备的。但問題不在于法制完备与否，而在于对这一現象的看法。这里，反映着两种立場观点，反映着立法工作兩条路綫的斗争。

我們知道，法律和政治、艺术一样，是一定社会經濟基础的上層建筑，它决定于經濟基础，随經濟基础的产生、發展、变更而产生、發展、变更；而当它建立起来之后，又反过来作用于經濟基础，为經濟基础服务。基础是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內容，而政治、法律则是基础的思想形式。由于在發展过程中，內容先行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內容；先有阶级斗争的實踐，然后有法，而不是顛倒过来，先有法而后有阶级斗争的實踐。因此，从理

論上來說，隨着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動，法制由簡到繁、由不完備到逐步完備，這正是發展的規律。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說，我國當前法制還不夠完備，這正是我國過渡時期經濟關係和階級鬥爭狀況的反映。過渡時期，這是經濟關係大變革時期，在這時期里，要把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也就是說，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私有制沒有完全改造完成之前，經濟關係極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要制訂出帶根本性的、長期適用的法律是有困難的，勉強制訂出來，也是難以適應實際情況的需要的。如民法，其主要內容是關於所有權問題，在私人所有制尚未完全改造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以前，制訂出民法典來，肯定和保護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就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而只利於資產階級。

從政治方面來說，過渡時期是階級鬥爭極為複雜、尖銳的革命暴風雨時期。為了消滅敵人，消滅剝削階級，必須依靠廣大群眾的直接行動，而不能僅僅憑借法律。正如列寧所說的：“假使我們會希望頒布百十個法令就可以改變鄉村全部生活，那我們就真會是十足的呆子了。”^①既然這時期的階級鬥爭主要是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也就是人民群眾自己實行專政，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制訂完備的法律不但是不需要的，反而會束縛群眾鬥爭的手腳，對鬥爭不利。劉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革命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初期，為了肅清殘餘的敵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壞反動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據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規定一些臨時的綱領性的法律。在這個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從反動統治下解放人民，從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下解放社會生產力，鬥爭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因此，那些綱領性的法律是適合於當時的需要的。”^②這是對我國解放幾年來法制工作的正確總結。

還必須指出，我國的立法工作，是堅持總結經驗，走群眾路線的方針的。法律根據政策而擬訂，但要使政策具體化，必須把政策貫徹到群眾中去，再從群眾的實踐，逐步總結經驗，集中起來，使之條文化，成為正式法律。這樣，要擬訂一些帶根本性的、長期適用的大法，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經驗，而不能閉門造車，短期內就樣樣俱備。右派分子允許國民黨在奪取政權十多年以後才正式頒布刑法，（其實國民黨的刑法還是抄襲清末“暫行新刑

律”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的。）而對我們，却無限時刻，無理攻擊，這是何居心？！正如列寧駁斥叛徒考茨基一樣：“……這位‘莊嚴的學者’容許英國資產階級在數世紀內去編制與規訂新的（對中世紀而言是新的）資產階級憲法，但對於我們俄國工人與農民，這位奴仆科學的代表，卻不願給予任何期限。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內就制出無微不至的憲法。”^③

右派分子攻擊我們靠政策辦事，不靠法律。其實在法律未完備時，把政策作為法律依據又有什么錯誤呢？大家知道，政策是法律的靈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和條文化。在未有具体化、條文化的東西以前，依據比較概括的東西，有什麼原則的區別呢？右派分子這種指責，只說明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法律。

既然我國當前法制不夠完備的狀況是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反映，那末，為什麼右派分子要這樣大叫大嚷，攻擊我們“無法可依”、“法制不完備”，並把這說成是許多錯誤產生的根源呢？這不是偶然的。資產階級反對社會主義，害怕群眾運動，仇恨革命鬥爭。他們要把群眾的行動限制在他們所容許的範圍里：只准改良，不准革命。因此，他們要用所謂“完備的法制”來束縛群眾的手腳，以免“侵犯”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另一方面，又冀圖迅速擬出“完備的法律”，以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抗拒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寧願要國民黨的“惡法”，卻不准人民民主法制逐步完備，這不正說明他們的居心嗎？

二

右派分子對我國人民民主法制進攻的第二支毒箭是攻擊黨和政府“有法不依”。他們惡毒地誣蔑“共產黨是很忽視法制的”；“許多黨員作事，往往不講法律，不講制度”。他們甚至認為：“造成過去年代的許多錯誤，其原因決不是‘三害’。在這後面還有更深刻的根源——國家的政治生活缺乏民主，社會主義法制沒有得到尊重。”

右派分子這種攻擊，如果指的是不依國民黨的“六法全書”，那倒是正確的；但如說我們不依人民

① 轉引自李琪的“我國刑法是不是制定的太遲了？”一文。

②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③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的法，那就是一种歪曲事实的誣蔑了。我們党、政府和司法机关是一貫严格依法办事的。因为党和政府跟全国人民是利益一致的，党和政府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別无其他私利。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即党和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新中国的法律，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法律，由党和政府拟制出来，党和政府有什么必要不依据自己所拟訂頒布的法律行事呢？

从我們的司法实践來說，我們司法机关一貫來也是強調依法办事的。它們把“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繩”作为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則，并在实际工作中認真加以貫徹。自从宪法和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逮捕拘留条例等頒布以后，司法机关更在实际工作中，強調貫徹法制。就广东來說，現在各級法院审理案件都已依法执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議、辯护、上訴、回避等制度，使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严格依法办事。公安、檢察、司法三机关之間，也能依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通力合作，互相监督，任何机关任何干部不依法办事，都会被糾正；違法乱紀的，还会依法受到制裁。化县公安局副局長陈立达和县委書記兼公安局長郑禎，非法指揮民警开枪打死打伤反对修建瘋瘋村的老百姓，結果不是一样受到法律的制裁嗎？

从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结果來說，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絕大部分的案件是审理正确的，冤錯案只是个别的。这也証明我們的司法机关是真正依法办事的。因为案件处理的正确性也就是合法性。依法办事的要求，无非是要案件审理正确，避免錯誤，既然絕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处理正确的，这还能說“有法不依”、“无法无天”嗎？

三

右派分子在对人民民主法制进行种种誣蔑和攻击之后，就接着提出要恢复旧法和旧法学，說旧法和旧法学还有其有价值之处，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則說：“美国法制比中国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求我国建立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法制。

旧法应不应该廢除呢？这問題本来司法改革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已給予明确的解答。几年来的司法实践，也証明这答案的完全正确。現在右派分子又提出这問題，其目的无非是要翻司法改革的案，从而为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找寻法律根据。

大家知道，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具有强烈的階級性，任何法律，都只能是一定統治階級保

护其階級利益的工具。統治階級改变了，法律也就改变。特別当多数劳动者对少数剝削者的專政代替了少数剝削者对多数劳动者的專政的时候，旧統治階級的法律更应全部廢除，不能襲用。列宁教导說：“社会主义无产階級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它正面临着而且不可避免地面臨着一个革命的群众斗争，这一斗争將粉碎被宣告死亡的資产階級社会的全部法制。”^①在我国，还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已正式宣布廢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書”。

是不是旧法中也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們不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呢？这种說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法和旧法是从两种互相对立的經濟基础所产生的两种本質完全不同的上層建筑，其中縱然有些法律条文是極相似的，但因經濟基础不同，相似的两种法律条文也就具有不同的本質，根本无所谓繼承性。至如說，法律规范本身无階級性，旧法中也有某些代表全民利益的条款，这种謬論，也是早已破产了的。“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六法全書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謂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階級斗争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現；即反动統治階級为保障其基本的階級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見，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顧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試圖爭取的同盟者的某些部分利益，企圖以此来巩固其階級統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圖以此来緩和反对它的階級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的六法全書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謂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把它看作是基本上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法律。”^②

“美国的法制比中国好”嗎？且看看事实吧。美国的資产階級法制，对于資产階級是天堂，而对于劳动人民則是專橫和騙局。如果說，在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資产階級还用過所謂民主法制的幌子来欺騙人民，而到了资本主义走向垂死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所謂資产階級法制，已为塔虎脫——哈特萊法（即劳动关系調整法）、麦卡倫法（即内部安全法）和“共产党管制法”等等違反美国宪法的法西斯化的法律所代替了。在现在的美国，法制原則已受到严重的破坏，华尔街老板、三K党

① 轉引自高里亞柯夫，“列宁論法制与审判”。

② 中共中央关于廢除国民党的六法全書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則的指示。

人、流氓、阿飞可以横行无忌，逍遥法网之外；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要求和平的广大人民却得不到法律的保障。震动全世界的罗森堡夫妇的冤狱，就是今日美国最典型的“法制”。右派分子仇恨我国的人民民主法制，而向往于美国那种保护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法制，这还不正说明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吗？他们要求恢复、继承旧法和旧法学的真意，也正是要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来代替我国的人民民主法制。

这还不明白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进攻，正是梦想以资产阶级的法制来代替人民民主法制，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种阴谋企图是阴险毒辣的，但是，他们的好梦难成，当他们刚刚伸出罪恶的魔爪，就给砍断了。为了消除右派分子在法学问题方面散播的毒素，我们必须继续和他们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法学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广州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文化遗址又有发现

继广州市东郊飞鹅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之后，最近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番禺县龙洞乡盆地（距飞鹅岭遗址不到一公里）四周的小山岗上，又发现了与飞鹅岭遗址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十三处。

这些遗址中以镗山遗址、蟹山遗址、林校标本园遗址、西园庄遗址、村底山遗址为最重要。

采集得的石器以有肩、有段、梯形、方形的斧、锛和磨石为最多，也有镗、刀、镗、刮削器、藤、网坠、敲砸器、压捶、饼、环、磨盘和石片等共一百二十件，其中以粗厚身的磨光有段石镗、腰子形的刮削器、半月形的小石刀、用火石作原料的琢制有肩石斧和磨光石镗最为特式。石器以琢制为多，磨光者较少。石料有砂岩、板岩、火石、頁岩、玄武岩、云石，以砂岩和火石为多。

陶器的陶系多以印纹硬陶为主，多数遗址并夹有少量的印纹泥陶和夹砂粗陶。只有村底山遗址以夹砂粗陶和印纹泥陶为多，印纹硬陶则最少，从其所出的较原始的石制工具来看，此遗址在时间上似较其他十二处为早。

此外旭园遗址、村岗遗址、通心岗遗址、林校标本园遗址除有大量印纹硬陶外，还有饰以夔纹、篛纹的挂青绿玻璃釉的釉陶，有较少或没有石器，故其在时间上很可能较其他八处遗址为晚。

完整的印纹硬陶器有双耳陶缶、豆、罐、纺轮和二个釉陶豆、一个釉陶盘共九件，印纹硬陶的火候很高，质料较好（经过淘洗和没加羼和料），并用轮制和模制法，表面加饰有打印、刻画、模附、附加和抹平。花纹有方格、米字、夔、雷、乳丁、双圈、曲尺、篛、蓝、划等种，更多的是由几种花纹印划在一起的组合纹。印纹泥陶的花纹较简单、原始，一般只有曲尺、蓝、方格等种，也有极少与印纹硬陶相同的其他花纹，夹砂粗陶多为素面，它们的质料与火候均较印纹硬陶差，制法多尚手制。

从上述遗址的发现，大致说明生活在广州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其聚居范围应从原来的飞鹅岭往东伸延至龙洞乡一带约十多个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他们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居民的文化较低，使用着较原始的石制工具、夹砂粗陶和印纹泥陶的器物。中期居民的文化较高，使用着比较进步的石制工具和印纹硬陶器物。晚期的居民还使用挂青绿玻璃釉的釉陶器，从石制生产工具少有发现的情况来看，极可能青铜器已经出现。这些发现，对于了解飞鹅岭遗址原始居民的年代与生活面貌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南越族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莫稚）

批判修正主义，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

楊奎章

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 和社会根源

从历史上說，修正主义这一名詞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出現。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信奉馬克思主义的招牌，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在不損害資產階級統治的根本利益、不改变資產階級統治的現狀的前提下，玩弄馬克思主义的詞句，“宣揚”它的个别原理和結論，然后却以馬克思主义“审查者”和“修正者”的姿态，閹割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內容和战斗性質。由十九世紀末叶到二十世紀初期，是修正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第一次泛濫的时期。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打着“批評自由”的幌子，从共产主义运动內部来进行反对馬克思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肆意“修正”；在法国，社会党人麦里蘭并由理論上的修正主义發展成为“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于1899年公然参加資產階級反动政府作帮凶；在英国，則出現了主張以階級妥协代替階級斗争，以改良主义代替社会革命的費边社派；在第二国际时代，出現了以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为代表的更狡猾、更巧妙的修正主义形态，他否認用强力革命摧毁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專政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硬把民主和專政看作是机械对立的东西，誣蔑“專政就是毁灭民主”，无产阶级專政就是“个人独裁”，而提出关于“普遍平等”、“純粹民主”的資產階級虛偽理論来反对无产阶级專政学說；在俄国工人运动的队伍里，还先后出現过經濟派、孟什維克、巴札洛夫、盧那卡爾斯基等修正主义即右傾机会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尽管所持的主要論点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問題上加以总括，不外是：用庸俗的进化論或折衷主义的二元論的世界观，来代替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一元論的科学的世界观；用把事物的变化發展看作仅是量的漸进發展过程的庸俗的相对主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来代替一定的量变导致質变、由漸进的發展到突变的飞躍的革命的辯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用階

級斗争熄灭論和对資產階級的投降，来代替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学說。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是，他們总是打扮成拥护馬克思主义的样子，“不去公开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基础，表面上似乎是承認它，而实际却以詭辯論来抽去馬克思主义的內容，把它变成无害于資產階級的神聖的‘偶像’。”^①他們“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反唯物論的学說化裝为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的特征。”^②列宁曾經为保卫和發展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作过長期的斗争。他的“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等巨著，为我们提供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的典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陣营和资本主义陣营并存的局面下，近几年来，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又有所發展。不仅馬克思主义的敌人千方百计，或明或暗地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別有用心地歪曲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政策，妄圖把他們拉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也出現了某种修正主义思潮。例如美国修正主义者白劳德曾公开主張取消美国共产党，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在国际反共逆流一度猖狂的影响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內，也曾有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主張把无产阶级先鋒队的战斗的党，变为“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在有的革命胜利了的國家，在工人階級的政党中，也出現一些修正主义思潮，如否定工人階級政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的作用；否定階級斗争和无产阶级專政的必要，流行一种所謂生产力“学說”，認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見“列宁文集”第四册，人民出版社版，第66頁。

②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版，第362頁。

为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社会主义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来，而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必要性，认为这样做，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等等。这些修正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或者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

至于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我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小资产阶级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发生着影响。我们才刚刚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将较长期地存在并顽强地表现自己，这都是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土壤。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和平改造以消灭资产阶级的方法，使一些本来就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和立场去理解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彻底的革命性，理解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而是从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加以曲解，作为自己的修正主义的“论据”。

解放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的教育，但这主要只是着重批判了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官僚资产阶级思想，这和真正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还有一段距离；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相当浓厚的，更不要说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动摇性了。由于党在全国人民中有了无比的崇高威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已为全国人民所公认，不少知识分子认真进行了自我改造，认真学习 and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但是也有好些人，他们尽管由于看见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不得不使自己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理论体系中的资产阶级灵魂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在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在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这些人也就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助手。此外，在我们党内也有某些不坚定的分子，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则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觉悟水平，或则不善于识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这样也就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影响，成为修正主义者或修正主义的俘虏。

我国当前的修正主义思潮及其批判

修正主义既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它为右派分子提供了“理论”根据，扩大了反动政治影响，当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助手。

只要具体考察一下修正主义者是从那些主要方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就非常明白了。

一、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

首先，修正主义集中攻击和歪曲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竭力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从而达到他们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他们否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阶级学说。他们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于劳动人民的影响，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实质上就是革命叛徒考茨基取消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的翻版。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既包括经济战线，也包括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而归根结底，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扬言在过渡时期取消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只能是为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争取苟延残喘的机会。修正主义者还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如果再用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人为地制造矛盾”，从而得出“阶级分析论已经过时了”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尽管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的問題，资产阶级由于具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使我们有可能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但是在剥削与被剥削这一点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果抹煞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的一面，看不到它和工人阶级之间质的区别，那是明显地对于马

克思的階級學說的“修正”。右派分子章乃器正是在這種“理論”基礎上作出所謂“中國資產階級是紅色的資產階級”的荒謬結論的。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了，但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鬥爭，依然沒有結束，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次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證明這一點。毛主席曾及時地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①階級鬥爭既是客觀的存在，我們又怎能取消階級分析的武器，消極地放棄階級鬥爭，從而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中處於被動捱打的地位呢？修正主義者說階級分析的方法已經過時，其實，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倒是牢牢地抓住這種方法的，他們在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時候，不是到處搜羅地主階級殘余、富農、偽軍官、歷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滿分子嗎？而我們革命人民則由於掌握着階級分析的武器，用階級鬥爭的思想武裝了自己，才能够辨別香花毒草，識穿牛鬼蛇神，從而勝利地進行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可見，階級分析的方法並沒有過時，階級鬥爭的觀點也不能取消。

問題的要點不僅在於階級鬥爭，而是在於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階級鬥爭的原理，資產階級也是承認的。而取消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方法的修正主義觀點，必然導致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事實上，修正主義者也正是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肆意進行歪曲和攻擊的。他們誣蔑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害的溫床”，“要克服三害只有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借口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特殊形式，有意抹煞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或者誣蔑我國的人民民主只有專政和集中而沒有民主和自由。他們販賣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貨色，追求所謂“絕對民主”、“純粹民主”，把民主當作目的，不承認是手段。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之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

（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②國家從來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不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剝削階級任何時候都只占全民人口中的少數，因此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資產階級的民主只能是供資本家少數人所享用的“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人是天堂，對於窮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是騙局的民主制”^③。無產階級專政，是絕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因此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供廣大勞動人民享受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的民主制。情況正是這樣，“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④民主只能是手段。達到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民主的不同目的。

對馬克思的階級學說方面的修正主義“理論”，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的專政；而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則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基礎。

修正主義否定黨的領導

資產階級右派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領導和核心力量，因此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矛頭還集中攻擊黨的領導，修正主義者也竭力在這方面提供“理論”根據。他們從上面的取消階級鬥爭的荒唐假設出發，得出結論說“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在階級鬥爭時期需要，現在建設時期可以不需要了”；他們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要黨退出這裡，退出那裡；他們還“建議”“黨只管方針政策，具體工作可以不要過問”；或者認為“黨只要管政治思想工作，不必進行具體領導，否則就會產生官僚主義”。所有這些謬論的客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9頁。

③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38頁。

④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5頁。

观效果，都是为资产阶级篡夺国家领导权扫清道路的。

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自己的政党，作为本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领导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一条主要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组织，除了人民的最高利益之外再没有自己的利益，不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理论到党的生活的实际，都说明党是和宗派主义根本不相容的。现实生活也证明了，中国革命固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及时提出体现全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方针政策和建设计划；并以伟大的魄力和艰巨复杂的组织工作，去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些方针政策和建设计划而斗争。要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共产党才是“内行”。我们所说的领导，是指党对各项工作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和组织工作上的领导，而并不等于要党去包办各项工作的单纯技术性和事务性的问题。我们也不容许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学术研究团体或纯粹的宣传机关。

修正主义否定国际主义原则

在国际问题上，修正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力”，宣扬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明”，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提供的基本经验和苏联四十年来的伟大成就，把学习苏联一律称之为“教条主义”，否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兄弟合作，以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和教条主义根本相对立的。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一个国家的具体特点。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宣言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襲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

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既要反对盲目抄襲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又要反对否定国际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倾向。苏联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苏联对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进步运动一贯给予重大的支持，最近两个人造卫星上了天以及其他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更加雄辩地说明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强大堡垒。这种情况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任何人人为主决定的。苏联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贯给予伟大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国的兄弟友谊，不但对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是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我们必须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须坚持向苏联学习，必须坚持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支持、兄弟合作的国际主义原则，而坚决反对否定这些国际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观点。

修正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表现

我国当前的修正主义思潮也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在哲学的根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绝对性问题上，就有人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不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典型二元论观点，企图否定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根本对立和斗争。有人瞎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有相同之点”；胡扯什么“实验主义的‘此时’、‘此地’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间、地点、条件’论有互相启发的地方”。这如果不是庸俗无知的混淆是非，就是别有用心地歪曲，企图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人提出“不赞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一棍子打死态度”，甚至狂妄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完备地解决当前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修正和补充”，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作为国家制订方针政策的“指导原则”和“理论根据”，实质上也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从理论上准备了垫脚石。有

人則宣揚“不可知論”的观点，說什麼“社會科學中沒有真理，社會科學的研究只靠頭腦，因此不能真實反映客觀現實”，企圖以此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性和客觀真理性。修正主義者還反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認為“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強調黨性，就會束縛研究自由，妨礙獨立思考”。他們甚至露骨地表示自己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情緒，說“讀到對馬列主義某些原理論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文章就很感興趣，儘管自己對這些問題不太懂得”。修正主義者還極力否定黨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領導和解放以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誣蔑黨對社會科學“既不提倡，又不放手”，致幾年來“社會科學的研究出現冷落蕭條的現象”。所有這些謬論，都是為了動搖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國學術思想界的指導地位，動搖黨對社會科學和思想戰線的領導，從學術思想上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或者有利於資本主義思想的發展。

必須堅決徹底地批判修正主義

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①問題”中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这个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因此，為了從理論上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及其在我國的指導思想地位，我們必須對修正主義在各方面的表現加以揭發和批判。

首先，必須把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和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廣泛深入的全民整風運動密切結合起來，從而從理論上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和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教育廣大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水平。自然，我們不能將思想戰線上的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和政治戰線上的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混同起來。右派

分子常常使用修正主義作為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武器，但是具有修正主義思想或持有某些修正主義觀點的人卻不一定都是右派分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自由討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決不容許政治上的右派分子，把自己的政治面目掩蓋起來，企圖混在修正主義者的隊伍里而蒙混過關。

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還必須與反對教條主義密切聯繫起來。修正主義經常是作為教條主義的反對者而出現。教條主義妨礙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破壞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活潑的創造和解決實際問題的無限威力，這就給修正主義提供了“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借口和“根據”。而在修正主義滋長泛濫起來以後，兩者又容易互為利用、互相補充，從不同角度來破壞馬克思列寧主義，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同時，有些修正主義者本身往往就是教條主義者，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考茨基、鮑威爾等等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便是他們不懂得這個真理，不善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應用這個真理。”^②由此可見，要不犯修正主義的錯誤，同時必須警惕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中不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為了勝利進行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我們應該認真學習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各項文件，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③問題”。這些文件，特別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所肯定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五條基本經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④問題”中關於區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也就是我們區別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可靠的標準。此外，我們還必須認真學習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代表會議的宣言。宣言中所總結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共同規律，以及宣言中對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各種機會主義思想的批判，同樣給了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的強大的理論力量。

①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35頁。

欢呼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超额完成， 满怀信心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

(笔谈)

为和平事业贡献一切力量

楊荣国

1957年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期间，作了友好的会见，还讨论了各党所关心的问题——世界和平的问题，发出了一项庄严的而又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公报——和平宣言。

这宣言指出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虽在力图发动战争，战争的阴影仍然存在，且一旦战争爆发，它的破坏性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增大百倍；但是今天世界的情况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改变了，由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下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坚持和平，战争是可以防止，而和平也是可以维护住的。

同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也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是要建成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各族人民的繁荣、各民族间永久和平的社会。故我们只需要持久的和平，以便于建设这种繁荣、幸福而无压迫、无剥削的和平的社会。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科学和技术的空前发展，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幸福。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繁荣和幸福，自是促进了和平事业的发展 and 消除战争阴影的有力因素。

我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自1953年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胜利

地超额完成了。在这五年当中，除了农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外，特别是工业方面，在一百五十六个重工业的建设中，已有了五十七个重工业建设成功，并已投入生产了（此外还有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十个）。而今年又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我们有信心，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成就，一定比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大，建设得更加迅速。因为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造，特别是通过去年以来的整风反右和工作的改进，又通过农村和工厂的社会主义的大辩论，社会主义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地增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定开展得更好，其建设的成就自是更大，建设的速度自也加快，这是肯定的！

我们这样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一面自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繁荣和幸福，另一面也是有利和平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刺激着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又是为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而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迅速的开展。

因之去年以来，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在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制定了全国十二年的科学规划——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并为科学工作者设置种种优良条件，使之潜心研究。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有信心在十二年内，使我们的科学在主要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一切，說明了我們的科学研究，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又說明了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科学工作者才能有良好的条件，才能作出統一的规划，才能使科学研究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而服务。

然而右派分子企圖使资本主义复辟，制訂反动的科学綱領，要使科学研究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不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設而服务，且企圖从复辟资本主义中而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作为帝国主义帮凶而猖狂地进攻人民的事業，所以资产阶级的右派就是反动派，他們的反动的科学綱領，受到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痛斥。同时，必須指出，这种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科学，只是侵略者的工具而决不利于和平事業，不利于和平建設的。

而我們須要和平，维护和平，又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因而我們的科学研究，是有計劃的，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与方法而进行研究的，是为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而服务的。

由于这，我們培养的科学工作者，首先是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中培养科学知识科学与科学技能，使所學習的科学知識与科学技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

在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中，我們的方法，除了

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外，另一方面，我們还应当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專業的研究中，認識真理和接受真理，使之成为又紅又專的科学工作者。

在这一点上，我們在文教崗位上的科学工作者，自己自应坚决地进行思想改造，如通过体力劳动，参观實習，通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學習，与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批判等等，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与理論的水平，从而加强自己業務的政治思想和理論的水平，亦从而提高了教学的水平。自己教学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則不仅使受業者增强对業務的分析能力，加深对这一業務本身的認識，同时还培养了他們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达到又紅又專，为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而积极从事。

总的說来，我們的这一切：从第一个發展国民經济五年計劃的胜利完成和第二个發展国民經济五年計劃的开始，以及十二年的科学规划的制定，使我們从明确科学研究的方向中更具有坚定的信心来努力完成这些科学研究的計劃。

我們沒有任何侵略的野心，我們有的是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設而奋斗到底的决心，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世界的持久和平，所以我們誠摯地拥护和平宣言，愿为和平事業而贡献一切力量。

进一步提高教育質量

阮鏡清

1958年来到了。这是我国国民經济建設第一个五年計劃超額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計劃开始的一年，也是在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的情况下来到的一年。我国經济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这种偉大的成就和深刻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文化教育战綫上来，并促进着我国文化教育事業繼續前进。

建国以来，特別在第一个五年建設計划期間，我国的教育事業有着蓬勃的發展；不但在質的方面起了根本的变化，在量的方面，無論高等、中等、初等或幼儿教育，都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任何时代。正由于我們各級教育事業發展得很快，而且今后还要繼續大大地發展，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执

行期間，我們必須注意把教育質量再进一步地加以提高。而提高教育工作質量的最根本的問題，主要是認真貫徹执行毛主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确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發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按照这个指示，我們普通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業的有相当文化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同时为培养專門人才打下普通知識的基础。这个教育的方針任务，当然首先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經济建設需要而提出的。因为任何社会的上層建筑都要为它自己的經济基础服务，我国的教育事業也同

样要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同時這個方針也意味著：配合著我國政治上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已進入高潮的新形勢，要求我們的教育繼續進行改革和提高。

由於這樣的要求，我們現在必須進一步根據這個新的方針任務，在過去幾年教育改革的基礎上，對現行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等徹底地加以改進。並且在實際工作上又必須把學校教育同現實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結合起來，同社會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以克服過去教育忽視政治、脫離生產的缺點。因此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我們必須加強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加強勞動教育，同時要不斷批判錯誤的意見和做法，特別要批判那些片面強調個人利益、極端民主、絕對自由、輕視勞動、先專後紅、死鑽數理化等個人主義的、純技術的觀點。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與新的教育方針不相容的。

這個新的教育方針，是與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相一致的，是全面發展教育方針在當前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形勢下的具體化。在貫徹這一新方針的時候，我們必須抓住培養體力勞動者這一中心環節，切實地把教育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教育為什麼一定要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呢？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告訴過我們：“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方法，並且是唯一的生產一個全面發展的人類的方法。”

這樣看來，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進社會生產，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固然要把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並且為了培養人的全面發展，消滅過去那種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也必須使兩者結合起來。所以我們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重視普通文化修養的同時，必須加強勞動教育，重視各科與工農業生產的聯繫，特別要結合各式各樣的體力勞動來打好基礎。

但要貫徹這個培養勞動者的教育方針，實現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原則，“人”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問題。在我們的学生中，目前許多人還存在輕視工农、輕視體力勞動的思想，他們畢業後不願意參加生產勞動；而在我們的某些教師中也並不是完全解決了這個思想問題，他們不重視勞動教育，認為自己最好多培養一些腦力勞動者，片面鼓勵學生升學。這些都是說明我們在教育工作上資產階級的思想還是嚴重存在着，必須徹底加以鏟除。

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在1958年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我願與全國教育工作者一起，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繼續改造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思想水平，並在這個基礎上來貫徹新的教育方針，進一步提高教育質量，在培養年青一代的事業中作出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更多更大的貢獻。

科學工作必須依靠黨的領導

容 庚

右派分子堅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對黨和社會主義的各種偉大事業，無不肆意歪曲，尽情誣蔑，甚至從根本上予以否定。他們只在口頭上說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但實際上他們對黨和社會主義是極端仇視的，碰到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時候，便猖狂地向黨進攻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這群凶惡的豺狼，妄想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企圖復辟奴役人民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種情況在科學領域中也是一樣。許多右派分子披著科學家的外衣，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並在群

眾中以惡毒的言詞來攻擊黨，說什麼黨不能領導科學。他們到處叫囂什麼“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他們竟無恥地提出什麼“保護科學家”的口號，別有用心地強調某些黨員負責同志在業務上或科學技術上暫時還不夠精通的一面，便斷言黨只能領導軍事政治，而不能領導科學。這完全是右派分子惡意製造出來攻擊黨的謬論，企圖篡奪黨在科學領域上的領導權，把科學事業推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我們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為了使科學事業不至於倒退而獲得蓬勃的發展，首先要粉碎右派分子的陰

謀，積極投入反右派的鬥爭。這場激烈的反右鬥爭，對我們科學工作者來說，也是一場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我們必須在反右鬥爭中來鍛煉自己的立場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服務。

我們認識到，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既適用於社會科學，同時也適用於自然科學。因此，我們的科學工作，必須依靠黨的領導，才不會迷失方向，才能使科學事業真正做到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和六億人民的要求。我們知道，在反動統治的社會里，科學的發展受着很大的限制。這是由於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階級利益所決定的。我們的科學事業，是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的，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截然不同。我們的科學事業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有輕重緩急之分，密切地與國家經濟建設相結合，既能保證目前的需要，同時又能體現長遠發展的前途，具有高度的優越性。解放以來，黨對科學事業是非常重視的，對科學家的關懷和照顧也無微不至。為了有計劃地發展工業、農業、交通、文教、衛生、科學等事業，黨和政府

制訂了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發揮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吸取了蘇聯的先進經驗，在各個生產戰線上獲得了輝煌的成果，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從根本上改變了國民經濟的面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更好的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黨更號召“向科學進軍”，並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在十二年內使我國的主要科學部門趕上世界科學水平。1956年集中了數百名科學家，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詳細研究，反復討論，花了將近半年的时间，草擬了十二年國家科學規劃，規定了五十七項重大的科學研究任務。這些偉大的科學任務和措施，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我活了六十三歲，親身看見國民黨統治中國幾十年，國民黨反動政權不但不重視科學工作，而且摧殘科學事業，甚至迫害有良心有正義的科學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八年，各種事業蓬勃地向前發展，科學事業也欣欣向榮，這些偉大的成就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分不開的。我們的科學工作必須依靠黨的領導，科學家們必須加強思想改造，永遠跟着共產黨走，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全心全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

讓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的基本上前進吧，

劉 渠

記得在抗日戰爭結束的前後，有一個學電氣工程的朋友對我說：他打算與一伙人搞一個小型的電工器材廠，專門製造電話機等電訊器材。可是年復一年，我始終沒有看到一架國產的電話機出來。其實不說電話機，就連我們家里每天用的電燈泡、電機也非依靠舶來品不可。至於工作室內教學用品那就更不用說絕大部分都是洋貨。可是曾幾何時，在人民革命勝利以後的短短八年中，竟然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生產力！不用說上述那些電氣器材已完全可以自製了，而且更複雜困難得多的東西也完全可以自己解決了。成套的紡織機器，成套的制糖機器不是一部一部的制出來，在我們新建的廠房中安裝着

和轉動着嗎？象燕子一樣的國產噴氣式飛機，不是在全國各地那天成群的飛過天空，並且在技術表演中證明它的性能的優良嗎？解放牌的汽車不是已經在全國各大城市和鄉村不停的在擔負着繁重的運輸任務嗎？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面貌，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八年來全國人民的努力，已經大大地改觀了。難道這樣一個奇蹟還不值得我們歡呼嗎？

儘管右派分子別有用心地顛倒是非說我們的經濟建設搞糟了，但是事實究竟勝於雄辯，緊接着三年經濟恢復，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僅勝利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就工業生產總值說，

可以超过原定1957年计划的17%，即比1952年增长1.3倍。在国家计划的四十六种产品中有三十五种已经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五年期间也大约提高了55%（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就农业生产来说，尽管在这五年中有过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水旱风灾，但到去年底止预计也将超过五年计划指标的2.5%，即比1952年增长26.4%。由于生产之不断发展，因而不单社会的就业面跟着扩大，而且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提高了，即1957年比1952年约增加40%左右。同样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可增长30%左右。从这些事实中就可以完全粉碎右派分子的謬言。

其实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成就还不仅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国家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这一旧生产关系的解决，也就反过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的发展，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的。首先，由于这一计划的完成大大加强了全国劳动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理想是中国工人阶级三十多年来奋斗的目标，这种理想也早在苏联实现了；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接着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且同时就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呢？的确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前有一些人是信心不足，甚至怀疑的。但是今天巨大的成绩摆在面前，谁还再敢怀疑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这一伟大计划的完成，不单打破了一切怀疑论者的谬见，而且也大大加强我们的信心。

其次，由于这一计划的完成，就使我们摸索出一条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老实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的过程，虽然有着丰富经验的苏联老大哥的无私的帮助，但假如不是

经过自身的实践和体验，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不断的总结经验 and 推广经验，那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摸索，今天我们取得了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比较完整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取得也就为往后几个五年计划的进行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这对于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

同时由于五年计划的完成，也就培养出一支强大的生产队伍和科学技术干部。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新社会的教育和鼓舞下，各个生产战线上出现了无数英雄模范人物。在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就有二百六十万人。其中如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发明反围盘的王明山，高速切削能手盛利，创造大豆先进榨油法的李川江等都是对生产建设有很大贡献的劳动英雄。生产战线上有了这一批卓越的先进工作者带动着一千二百万的强大的工人队伍前进，那就可以保证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之顺利的进行。同时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壮大和提高了我国的技术力量。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952年还不过十七万多人，而经过五年建设的培养与锻炼，预计1957年底将达到八十万人，即等于1952年的三倍半。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几年来在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与专家的指导下，技术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现在一般大型企业如机器制造工厂，钢铁联合工厂，电站，水库等除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以外，都能自己设计和制造了。这是我国工程技术上的一个大跃进。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还培养出高等学校毕业生二十七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八十四万人，这也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

而这些成就也就正好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满腔热情和满怀信心地来迎接这个伟大事业的。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尖锐的反右斗争，与全民性整风的伟大教育之后，必将在生产战线和文化战线上出现一个无比的热潮来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任务。让我们高举胜利的旗帜前进吧！

党领导下的人民教育事业

必然要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鄒 有 华

我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的时候，全国人民正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伟大的成就，并满怀信心地为迎接和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而继续奋斗。

就教育部門說，教育事业大部分是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为国家培养了各项建设干部，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例如：五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就为各部门输送出大量的生产建设人才，其中尤以高等学校的发展最为迅速。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八年计算，则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总数达三十六万一千人，比解放前五十年年的毕业生总数，还增长了69%。五年来，中学毕业生有四百三十万多人，小学毕业生有五千六百万多人，他们除一部分升学之外，大多数已分布在全国农业、工业及其他工作岗位，从事生产建设。1957年的在校学生数：高等学校的指标原为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人，而预计达到四十四万七千人，超额一万二千四百人；中学的指标原为四百七十万七千人，而预计达到五百六十八万人，超额九十七万三千人；小学的指标原为六千零二十三万人，而预计达到六千五百九十六万人，超额五百七十三万人。这说明了五年来各级学校招生任务的胜利完成，和今后几年内会有比预计更多的学生毕业，可以参加生产建设或升学。此外，关于业余教育方面，1949年全国工农群众在冬学和民校中学习的有一千三百二十六万多人，到1956年则已达到七千九百万多人，增长了六倍。扫除文盲工作，五年计划的指标为二千三百万人，但今年预计已达到二千五百万人，超额二百万人，且已有一百六十万人提高到了高小或初中的水平。

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质的提高。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即已实施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权性质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社

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教育得以出现。社会主义教育的实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科学揭示：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要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密切地结合并成为建设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武器之一。教育以全体人民为对象，但要为劳动群众的子弟建立良好的条件；其目的是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自觉积极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伟大正确的思想指导又必须通过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具体领导来实现。中央教育部早在1950年即提出教育为工农服务和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建设方针，指导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1951年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把各级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列入学校系统，充分保障了工农群众及其干部受教育的机会；确定中等专业学校在学制中的地位及其与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的衔接，使教育能配合生产发展而积极地为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1952年的教学改革，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指示学校的教学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武装学生，并贯彻政治思想教育，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献身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1953年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即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培养建设干部的需要，以发展高等工科学校和综合大学的理科为重点，并适当地发展农林、师范等高等学校，而又于各高等学校中根据需要与可能分别设置各种专业，以期培养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建设人才。1954年政务院确定了教育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在这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又以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根据客观条件，合理地安排了学校网。1956年，全国有中学六千七百一十五所，内有四千九百二十九所分布在中小城市和乡村；小学有五十三万多所，内有90%分布在乡村和小城市里。加以招生的计划和学生成分的选

擇，現在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在中学已达到66%，在小学已达到80%以上。对于各级学校的畢業学生，控制其升学的百分比，并采取統一分配就業的办法，使各级学校得到合理的發展，并保證国家各項建設机构得到适用的人才。由此可見，人民教育事業超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固有賴于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党与政府的正确領導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議和报告，我們初步認識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劃中，摆在教育和科学工作者面前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培养建設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經济、文化發展的需要。在这一任务下的教育事業是努力發展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發展業余的中高等教育；積極發展中学，逐步举办業余中学；逐步推广小学，逐步举办業余小学；和全国各地努力扫除文盲等。其中的高等教育以發展

工科和理科为重点，五年內高等学校畢業生要求达到五十万人，比第一个五年計劃大約增長80%。由此可知1958到1962年全国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更加巨大的。

为了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中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艰巨任务，我們必須在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实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提高質量，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劳动生产教育，使政治与業務、教育与生产更紧密地結合起来。因此必須正确地認識并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教育方針，首先是教师要繼續进行思想改造，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使社会主义教育获得更輝煌的胜利。

全国的教育工作者，是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的基础上，来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中所給予我們的工作任务的。讓我們以最坚强的信心說：党領導下的人民教育事業必然要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積極改造自己，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

李 稚 甫

1953—1957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胜利地超額完成，向世界人民和全国人民显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下，完全有可能倚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經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設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执行結果，充分說明了人民一掌握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开辟历史的新紀元。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保證了我們能以很高的速度發展社会生产力，五年来在經济建設上和文化建設上的偉大成就，使我們感到自豪。我国人民正以无比信心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并欢欣鼓舞地迎接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开始。

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后的一年，也是帶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們不但在經济战綫上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爭取了工業的增产和農業的大丰收，而且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們击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反右斗争的偉大胜利，同时全民性的整風运动已进入整改高潮，并为迎接一个新的生产高

潮而进行巨大的努力。可以肯定，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这些胜利，將大大推动和鼓舞全国人民的積極性与創造性，也將保證我国物質生产力，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得到更快的发展，为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主要工業的生产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知識分子，沒有再比1957年这一年中所得到的教育和感受更深的了。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教育，不是过去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所能比拟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必須徹底地进行思想改造，徹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觀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倒向工人阶级一边，爭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不可能是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在学术思想上却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还有所留恋。政治立場与学术观点必須統一起来，保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立場，这一矛盾和思想上的兩面性必須克服，不然迟早会墮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毛主席說：“我們希望我国知識分子繼續前进，在自己工作和學習的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逐步

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深刻体会的。为什么知識分子在改造过程中会停頓甚至倒退。因为他不能克服个人主义和滋長了自滿情緒，那就会停頓；不肯放弃資產階級立場，那就会倒退。倒退会有什么出路？是死路一条。知識分子不是一个階級，但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为一定階級服务的，今天的知識分子，除了坚决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之外，肯定地說，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須自觉地进行改造。立場問題，是一个帶根本性的問題，而立場又必須通过实际斗争中来鍛煉，党号召广大干部和知識分子，参加劳动，上山下乡，参加火热的实际斗争，是帮助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最好方法之一。当然一切知識分子都要进行这样的思想改造，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說来，所研究的是階級性極强的科学，他們的根本任务是要研究和解答当前社会主义的实践問題，是要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不能不特別显得迫切需要，为了能在祖国

社会主义建設中做一个小螺絲釘，首先要求自己徹底地进行自我改造。科学家的改造，是發揚祖国优秀文化傳統，繁荣学术的先决条件，我們需要一个新的知識分子大軍，即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大軍，每一个知識分子，只要他虛心誠懇地、老老实实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坚持不懈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实际鍛煉，坚决轉變立場，都可以成为这新的知識分子大軍的一員，为祖国文化建設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們要把祖国建設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必須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实现科学远景规划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在科学事業方面，我們有偉大的友邦苏联的支持，相信在十二年內，不但可以消灭我国过去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空白点，并且可以赶上先进各国的水平。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了，我們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有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問題只在于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

“干部决定一切”。因此首先要改造好自己，争取做一个无产階級知識分子大軍中的一員。这是我新年中的感念和热誠的愿望。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胜利完成显示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孟 光

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第一个五年計劃是一个宏偉的計劃，它集中了巨大的人力和資金，同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巨大的援助。经过全国人民五年来的積極奋斗，現在已經胜利地超额完成了。这是中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巨大胜利。

通过了短短的五年時間，就在这么一个工業極其落后的基础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确立了社会主义經济制度，这不能不說是一种奇迹。这也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我們从第一个五年計

划的实践中可以充分地看出来：第一，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沒有剝削的經济制度，这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大量物質財富不是操縱在少数資本家手里，而是操縱在人民手里。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資本主义制度能够进行更大規模的扩大再生产的經济制度，因而它就可以大大地加速国民經济發展的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資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以資產階級获得剩余价值为条件，这是很有限的。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則以發展国民經济，滿足人民需要为条件，这是无限的。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它們对人民的殘酷剝削，正在宣揚它們

的“人民資本主義”，人民和資本主義本來是不相容的，因為人民正是資產階級剝削的對象。但是如果只以擴大再生產這一點來衡量的話，我想，社會主義倒是真正的人民資本主義，因為它是為人民而進行擴大再生產的，不是為資產階級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所以它才能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而重工業正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要以獲得剩餘價值為條件的這種局限性，也就是一般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從輕工業開始的真正原因。第三，社會主義制度是和偉大的國際主義分不開的。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系，但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彼此爭權奪利的關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或者是入主出奴的關係（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而沒有平等、互利、援助和協作的關係。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則完全是建立在國際主義精神上的平等、互利、援助和協作的關係。我們知道，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要是沒有蘇聯及

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也是不可能想象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地超額完成並開始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今天，回顧一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績，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因為這樣將會更加堅定我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鼓舞我們更積極去為實現第二個偉大的五年計劃而奮鬥。然而，右派分子卻閉着眼睛不看這些鐵一樣的事實，還大肆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完全站在少數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說社會主義搞糟了，生活“今不如昔”，在廣州則說解放後趕不上陳濟棠時代。當然，所有這些謬論，都已經在大量的事實面前被粉碎了。

社會主義是廣大人民的美好的社會制度，但社會主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要依靠全體人民用辛勤的勞動來建成的。讓我們用比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更大的勁頭來迎接第二個五年計劃吧。

廣東科學工作委員會成立

為使廣東的科學研究工作更好地貫徹和實現國家十二年科學事業遠景規劃，並密切地結合廣東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進一步發揮廣大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和潛在力量，推動科學事業向前發展，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根據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決定和廣東科學事業發展的需要，於去年十月間決定成立廣東科學工作委員會，以加強統一領導、計劃和安排廣東的科學研究工作。

科學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加強對地方科學研究工作的統一領導，保證本省對國家十二年科學事業規劃的重點研究項目的順利完成，並結合地方的具體情況，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與可能，制定地方的科學研究工作規劃，使科學研究密切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對各系統在地方的各部門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組織協調，

使科學研究工作能有機配合，更有效地展開，積極為科學研究工作創造條件，保證科學事業的順利發展。

科學工作委員會為進行日常工作，設一辦公室，下設規劃、資料、服務和秘書等四個組，現正在積極進行各種準備工作。今年將要組織科學家，根據國家十二年科學事業遠景規劃和廣東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特別是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修正草案）在本省的實施方案，制定廣東第二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中的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同時，還計劃籌建服務站，為科學研究工作解決化學試劑和儀器修配等問題。

此外，科學工作委員會為了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社會科學方面出版了“理論與實踐”學術月刊；在自然科學方面將出版“廣東科學”學術月刊，現正在籌劃中。

（顏觀輝）

批判董每戡的“三国演义試論”

饒芃子 黃天驥 吳文輝

“三国演义試論”是董每戡最近的“學術論著”。从这部装点着馬列主义的詞句而实则滿含毒素的“論著”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右派分子董每戡的反动的資產階級文艺观点。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著名的历史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时代紛乱、复杂的历史现实，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争，第一次用長篇小說的形式，使讀者有可能透过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及形象之間的联系，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特点，有了比較完整和全面的認識。在这部小說里，各个統治集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可能出現的斗争方式：无论是政治上或軍事上的紛爭，公开的或隱蔽的活动，都發展到極其尖銳的程度。特别是作者对正反面的人物，有着强烈的愛憎，这种感情和人民大众的感情是一致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六百多年来，都保有它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正統思想，并对农民起义抱着敌視的态度。但是，这些微瑕并没有掩盖“三国演义”的光輝。

可是，董每戡在他的“三国演义試論”中，并不是从分析作品本身出發，引导讀者認識“三国演义”的真实意义；而是因襲以往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者的文艺观点和方法，給“三国演义”强加上“爱国主义思想”的标籤。

董每戡在書中反复強調：“三国演义”是一部“充滿爱国主义精神”（第21頁）的作品。但董每戡所指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是狡猾地含混其詞。他說：“‘三国演义’給人民教育，不止限于普通的做人处事，还有更重大的鼓吹尊汉作用，这恰在元末出現，就非同小可”（第18頁）。又說：“‘三国演义’中所強調的汉室就是汉族”（第24頁），“‘三国演义’执行了以义相結忠于汉族的爱国主义教育。”（第25頁）显然，在这里，

董每戡是把爱国主义、民族意識和封建正統思想混同起来。他所謂“三国演义”有爱国主义精神或民族革命意識，實質上，就是指貫串在“三国演义”中的尊汉思想，拥刘反曹的正統思想。

为了替他的論点找寻論据，董每戡竟不惜歪曲事实，一笔抹煞了宋元以前人們一貫憎恨曹操的思想，認為“拥刘反曹、兴汉灭魏的傾向性，到了宋代开始才有”。因而把它看成“宋元兩代人民的思想感情”，說它是表征着当时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識和爱国主义精神。

誠然，宋代人民是憎恨曹操的，但宋以前的人民也同样的憎恨他（这一点，在“曹瞞傳”和“世說新語”都先后有过反映）。至于人們憎恨曹操的原因，正是因为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極端殘酷的統治者，他在破陶謙时，竟“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雞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書陶謙傳），在官渡之战时，又坑杀袁紹降卒七八万人，定出“圍而后降者不赦”的殘酷条款（魏志程昱傳引魏書）。所以，尽管曹操在統一紛爭局面这点上曾立过功劳，但人民仍然不会寬恕他那慘无人道的行徑。陆机一語道破了人民对曹操的意見：“曹氏虽功济諸夏，虐亦虐矣，其民怨矣”（辨亡論下）。宋元人民的憎恨曹操，主要是繼承前代人民的思想感情，而并非象董每戡所說的有什么“非同小可”的原因。

至于說宋代人民憎恨曹操的思想感情主要是民族意識所引起的，更其牽强附会。因为从作品本身說，“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并不是民族矛盾，而主要是封建社会內部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无论是刘备、孙权或曹操，他們都是騎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軍閥和帝王，尽管三者之間存在着極其尖銳、复杂的矛盾，但就其所代表的階級來說，却是一致的。所以魏、蜀、吳的矛盾，既不是民族矛盾，他們之間的斗争，也不可能是民族斗争。那么，董每戡所指的“民族意識”，从何而来？就是从历史上看，在三国以后，宋元以前，社会上也不只一次的發生过民族矛盾，但人民为什么就不会从民族意識方面着

想，以曹操来影射如安祿山之类的外族侵略者呢？

同时，董每戡还企图歪曲“三国演义”的客观效果，来证实所谓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论点。他认为“忠于大汉正统，在元末或清代的读者是可能会有联想及汉室实指汉族的客观效果的”（第22页）。

为了证明他的“汉室实指汉族”的谬论，他根据清代统治者曾禁毁“三国演义”，就说“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在清代可能会起反清的客观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清代统治者之所以列“三国演义”为禁书，主要在于它彻底地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教会了中国人民进行斗争的方法。如果“三国演义”真的有什么民族意识的話，他们为什么会把蜀汉的英雄关羽捧出来，封他为“灵佑忠义神武大帝”，来压低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对人民的影响呢？

事实上，如果照董每戡汉族即汉室的說法，那么，正统思想在“三国演义”中就是爱国思想了。这样一来，统治者镇压反对汉室的农民起义，岂不是成为“爱国主义”的行动？

董每戡从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出发，臆断“三国演义”具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并把这一论点贯串在他的“论著”中；还自以为发现了“三国演义”的本质问题，即正统思想实为爱国思想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正统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否真的表征着当时人民的愿望？

我们认为，正统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是存在的。然而正统思想的存在正说明了罗贯中思想的局限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向人民宣传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上天派下来管理国家的唯一人物，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是正统思想。它归根到底是统治阶级的东西。即使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可能也有着这样的观念，但不能因此就说它是进步的、是本质上属于人民的東西。

诚然，历史上每当战乱频仍的年代，人民迫切地期望着和平和统一，但是要求统一与正统思想并无共通之点。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正统抑或是非正统的皇帝，对他们都是一样，只要他能使人民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事实上，人民看“三国演义”时所以比较喜欢刘备，憎恨曹操，主要不是因为刘备姓刘，是汉室的正宗，而是因为他较之于其他统治者，比较具有“宽仁爱民”、“礼贤下士”等行为，在作品中，刘备的性格虽也有他虚伪的一面，

但他在统治人民的方法方式上，却明显的不同于曹操。关于这一点，在六十回他自己就有过自白：“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此外，他的“三顾茅庐”、“三让徐州”、“携民渡江”和四十四回的“宁死不忍作负义的事”等等，与曹操的“许田打猎”、“梦中杀人”、“借头压军心”等恶毒阴谋和“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也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历来人民爱刘备而恨曹操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

此外，董每戡又把“三国演义”的忠义问题，也附会为爱国思想、民族意识。他引李卓吾“忠义水浒传”的话：“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是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传，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由此推想，既然在水浒传中忠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有关，“那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那样处处强调‘忠义’，来兴汉，那就不无道理了。”（第29页）“一切有民族革命意识的团体几乎都采取了这桃园结义的方式，执行忠于汉族的任务”（第31页）。

“三国演义”所宣扬的义，在某些方面说应该算是当时社会中的一种美德，是中国人民最可贵的性格之一。关于这种义的内涵，“史记”游侠列传有过恰当的解釋：“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憂其軀，赴士之危阨，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由此可知，所谓“义”在社会上的积极性并不同于爱国思想、民族意识，更何况“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忠义与“三国演义”反复强调的义，本身就有所区别。

我们并不否认“三国演义”中的义的思想，在历史上曾有过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依然反对董每戡把爱国主义附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因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尽管有些具有民族意识，反对外族侵略的人采取了“三国演义”的斗争方式，学习了“三国演义”的平等对待、团结一致的精神，但依然不能说是“演义”本身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以董每戡所举的三合会誓词为例：“吾人同生同死，仿桃园结为兄弟，姓洪名金兰，结为一家。……两京十三省同心一体，讨灭仇敌，恢复明朝。”誓词中说“仿桃园结为兄弟”不过是他们团结的方式，至于“讨灭仇敌，恢复明朝”则是明显地与“桃园结义”完全不同的新的精神，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因而二者并不相等。

董每戡这样硬给“三国演义”强加上爱国主义的标签，正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文艺观

点，和暴露他的腐朽的地主阶级的正统观念。

二

董每戡虽然在“试论”的开头，就摆出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点的姿态，但这只是董每戡的一塊遮羞布，他的文艺观点，和胡适正好是“殊途同归”。

董每戡既然认为汉室实指汉族，那么，曹操篡汉，不正是等于侵略汉族么？而那些反对汉贼曹操的如关羽、周瑜等人，不正是汉族的民族英雄么？在这个“汉室实指汉族”的前提下，于是董每戡就胡扯几句似是而非的道理，断章取义地抄录了一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材料，得出了“三国演义”是具有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的作品，它“执行了忠于汉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结论。

我们知道，研究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必须从作品的艺术形象进行分析。离开了作品的形象来谈什么主题思想，谈什么“作品反映的本质”，只不过是唯心主义者的做法。而资产阶级的“学者”如胡适之流则正是如此，他们丝毫不理睬作品中的具体形象，采用一些穿凿附会的方法来歪曲作品的思想、主题，企图借此贬低或者偷换作品的社会意义。

谁都知道，汉朝和汉族根本是不相同的两回事，而董每戡说“汉室也许实指汉族”，不过是因为两个“汉”字而已；根据这两个“汉”字，就硬说反对汉朝便是反对汉族，忠于汉朝便是忠于汉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穿凿伎俩么？从这个穿凿附会的“假设”出发，董每戡找了一些“材料”来“求证”自己早已定下的结论，这和胡适的观点和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方法指导之下，董每戡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大的歪曲，关于这点，在他论述罗贯中创造人物形象方法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最露骨。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他描绘人物性格的时候，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依据的。当然，现实主义也容许虚构，夸张，但虚构和夸张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出发，如果只凭主观想象，那是毫无意义的。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罗贯中以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原型。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的人物就必须尽量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是，应该注意到，“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而是在大量吸取宋、元两代讲史和民间传

说的丰富养料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根据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当时讲史的艺人在叙述历史故事方面，大抵是“真假相半”。所谓“真”就是依据史书、传记的载录，保存历史的真实；所谓“假”就是想象创造。怎样想象创造呢？艺人们只有根据他们对现实的体验与观察，概括了种种富有生命力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并遵循着原有记载的线索，合情合理地来丰富这个故事。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所见到那样光辉动人的历史小说。可以相信，罗贯中本人进行加工创作，也一定走过这条道路。关羽、张飞等虽是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但也是宋、元、明三代人民所耳濡目染的英雄性格；曹操虽是三国时代的政治家，但也是宋、元、明三代人民所憎恨的统治者的典型。

然而，董每戡是怎样理解罗贯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的呢？他根据章学诚的说法，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地依据正史编撰的长篇历史小说（第14页）。所谓实，在他看来就是“依据历史传记”来编撰；所谓虚，则是作家的主观“想象”“生发”“放大”。这种观点，贯串在他的整本“论著”之中。

例如，在他分析曹操时认为，“罗贯中是怎样抓特征来概括的呢？我认为他仅仅只紧紧地抓住两个字来生发的”（第48页），这两个字就是“奸雄”。跟着，他就举几条历史记载，说明“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性格“确是根据各种记载来放大描绘”（第47页）。又如论刘备，董每戡认为罗贯中描绘刘备的性格仅仅是依照“三国蜀志先主传”，他首先引了“先主传”中的一段话，然后作出结论说：“‘三国演义’对刘备的写法，并不见过分夸张，依据了这个原坯（按：指“蜀志先主传”），同时也抓住这篇传的末尾数语为依据而写他的品性和行为”（第59页）。似乎，刘备的性格就是根据传末数语加上主观“放大”“生发”而成功的。再如论赵云，他认为赵云这个形象是罗贯中“不离史实基础地大加想象创造的，这个人物塑造的成功全在于夸饰得有血肉”，于是又引了“三国志赵云传”中几句话，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却以此寥寥数语作根据，想象创造，大显神通”（第91页）。

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总之董每戡强调“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是由历史记载加上作者主观想象构成的，而对于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现实基础，则一脚踢开。但是，谁都知道，“三国演义”之所以有着深广的影响，不仅是它教会了人民认识历史上的人物，而且使人民看到了生活在自己身旁的各式各类

的典型。正因如此，人民才会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多少年来，人民为刘、关、張的受挫掩卷嘆息，而对曹操的失敗則拊掌称快。显然，如果罗貫中不是把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統一起来，“三国演义”要获得这样深广的艺术效果是不可設想的。我們認為，董每戡抹煞了罗貫中創造人物的现实基础的做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實質上，他不过是企圖貶低“三国演义”人物群象的典型意义而已。

对于典型的構成問題，董每戡又提出主觀、庸俗的見解，他說罗貫中写曹操时，“写出人物的共性，也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从而構成了有血肉的典型，不光写缺点，也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优点”（第48頁）。他提出共性与个性的問題来，但他在分析人物时只是在个性方面做文章，根本沒有分析在人物个性中所体现的共性。在“試論”中，提出了問題但又沒有个下落的現象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写人物的优点和缺点的論断。从他的見解中可以看出，他不但重彈所謂写正面人物必須同时写他的缺点的唯心主义老調，而且反过來說，写反面人物也要同时写出他的优点。这在方法論上是極端的主观主义。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也是对现实人物的概括的反映；人物應該具有怎样的性格，有什么优缺点，是以现实的真实为轉移，而不是以作者的主观要求，更不是以董每戡的荒謬公式为轉移。

董每戡用“优点和缺点”来注釋“共性与个性”，这是不倫不类得出奇的觀點。显然，在董每戡看来，曹操的缺点就是他所說的共性，曹操的优点就是他所說的个性。从这里，就明显地看出他对典型問題的无知。在他看来，共性和个性是兩件东西，作者把这兩件东西拼凑在一起，就会“構成”一个“有血肉的典型”。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一般的東西只在个別的東西之中，通过个別的東西才能存在；任何个別的東西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一般的東西”（列宁：“关于辯証法問題”）。可見，典型的構成絕不是个性和共性或者优点和缺点的簡單相加，作家在塑造形象的时候，也只看到一个形象的整體，所謂典型的共性，乃是通过这个具体形象的整个性格体现出来。所以，恩格斯說：“每个人是一个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格分明的人”。董每戡則把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他說：罗貫中“根据‘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二語，尤其抓住其中奸雄二字来生發，既極力摹写他的奸、也不忘他的雄，所以我認為罗貫中沒有違

反历史真实，就在能活画出一个奸臣曹操，也活画出一个英雄曹操。同时又捏合为一个典型”（第48頁）。我們認為，这种說法是对现实主义罗貫中的一种極大的污蔑，把罗貫中的辛勤而又复杂的劳动，說成是捏泥娃娃一样，似乎罗貫中一手拿着一团“奸”的泥，另一手拿着一团“雄”的泥，兩下一捏，就捏成了奸雄曹操。其实，罗貫中并不是把曹操一方面处理为英雄、一方面处理为奸臣的，在罗貫中笔下的曹操，只是一个陰險毒辣的統治者的形象。人們給曹操以奸雄之称号，意在說明他是一个奸中之尤者。但董每戡竟不惜把“奸雄”一詞，攔腰斬为兩段。

三

文学批評家應該通过对作品的艺术分析，帮助讀者正确地認識作品的美学价值、正确地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以自己强烈的爱憎来感染讀者。这些，正是批評家头等重要的任务。

这样，对于一个文学批評家來說，艺术鑒賞能力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單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們認為，今天的文学批評家能否正确地引导讀者欣賞作品的价值，首要問題在于他有没有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觀，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場。如果批評家的立場是反动的，那么，他的批評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科学的，而且必然会給讀者帶來許多有毒的东西。董每戡在“試論”中分析人物形象时，正是暴露了这一点。

在分析关羽的形象时，董每戡花了很多笔墨去評論华容道那一节。表面上，他是为了分析罗貫中的艺术手法——拿华容道放曹和七十六回曹操“以怨报德”的場面作对比的手法；实际上他却拼命称贊关羽釋放曹操的行为。說什么：“在华容道一节是極写关羽之大仁大义”（第74頁），“借此特別有力地突出了关羽的大仁大义”（第75頁），“正因为罗貫中已經安排了华容道一場，才把讀者从感性認識上引向敬愛关羽的义”（第77頁）。还說这是“罗貫中說出了人民的意志、思想和感情”，是“絕好的高度的艺术創造”（第76頁）。这簡直是对人民的莫大侮辱。我們認為：关于如何評價“三国演义”中的“忠义”思想，如何全面評價关羽的形象的問題，尚有待專家們今后进一步探討；但华容道中关羽釋放曹操这种敌我不分的行為，即使在封建社会中，有些人把这种行為当作一种“美德”，今天，我們也應該作具体的分析，肯定这种放走敵人的行為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按照董每戡在“試論”中的看法：認定“汉室实指汉族”，那么，顛

复汉室的曹操就是外族侵略者的象征，这样，关羽的释放曹操，岂不是叛卖国家民族的、不可饶恕的大罪吗？从董每戡的逻辑推论，应该狠狠地批判关羽这一点才对，为什么却反而大赞关羽的“大仁大义”呢？这不仅表明了“试论”一书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说明董每戡是以反动的观点对待“华容道”这一问题的。

有人說：董每戡全部“试论”写得非常糟糕，唯独对曹操陰險奸詐的性格，却分析得相当入骨。我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董每戡是用什么态度和感情来分析曹操的这种性格的呢？原来他虽然一方面罵曹操“陰險毒辣”，一方面却又对这种陰險毒辣的才能表示欣赏。这种态度和感情，和他的認為罗貫中“活画出一个奸臣曹操，也活画出一个英雄曹操”（第48頁）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历史上的曹操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不能因此就肯定“演义”中的曹操有什么进步性。“演义”中的曹操是“奸雄”，“奸雄”决不等于“奸臣”加“英雄”；尽管董每戡在“试论”中十分注意引用实例，对“张飞胡”的“胡”字也不惜离题万里地考证一番，但对于曹操的优点，畢竟举不出一个例証来。所謂曹操的“机智乐观和积极”等“优点”，都是建筑在他的“奸”上面的。“试论”中所引的例子就已经充分说明这点，不必再贅。董每戡为什么偏把这些說成是优点呢？原来董每戡把这些概念的思想内容都抽掉了。不管董每戡怎样扭扭捏捏，閃爍其詞，事实上，他所拜倒的正是曹操的“奸”。他在“试论”中就曾露骨地說：“我們讀‘三国演义’，不是既憎恨曹操，又佩服他的本領嗎？”試問有那一个正直的人，看了“三国演义”，会佩服曹操那种陰險狠毒的本領呢！倒是大軍閥、劊子手如袁世凱之流，确曾对曹操的奸的本領拍案叫絕，拜倒在“奸雄”的脚下，大呼“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应遺臭万年”。而董每戡却企圖引导讀者和他一起去佩服这些本領，这是什么立場和观点，不是明明白白嗎？

董每戡虽然用了較多的篇幅来分析曹操奸險的一面，但这种分析与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欣賞。从“试论”中，根本看不到他对曹操这个奸賊有什么憎恨的真實感情。他說，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王粲等行为，“往往很容易被人們誤解为只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出發，挖掘他性格上的缺点而已”（第54頁）；曹操的奸險毒辣，在“演义”中触目皆是，为什么董每戡还要去“挖掘”才找得出来呢！董每

戡不是与人物同爱憎共呼吸地去憎恨和鞭撻这个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只是为了做应时的文章，才不得不来“挖掘挖掘”罢了。怪不得他的分析这样“客观”。当然，董每戡的狐狸尾巴还是常常露出来的。在“试论”中，他引了曹操勒死董妃、斬杀伏后伏完的兩段原文，接着便說：这些“在全書中是極重要的章节，也是曹操被打击的重要因素，比起性格上一般的缺点要大得多”（第54頁）；我們也認為这些情节是暴露曹操的罪惡的，但曹操东征西討，在几次战争中都大批屠杀人民，以致血流成河，惨不忍聞，那才是最大的罪惡。为什么董每戡看不見这些呢？为什么不說这些罪惡才是更“重要”、更“大”的呢？很显然，如果說董每戡在拜倒于曹操之余，对他还有一点憎恨的話，那也不是从人民的立場，而是从統治者的立場出發的。

刘备是罗貫中笔下的理想人物。因此，他把刘备写成一个忠厚寬恕的統治者。我們認為，在刘备的形象中，的确也体现出这个人物比較好的一面。但是，由于罗貫中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塑造这个典型的时候，一方面必然会把某些他認為比較好的統治者性格作为自己人物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会不自觉地把一些非忠恕仁厚的东西也刻划进去。这是因为现实或历史上的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不可能完全没有他們本階級赋予的特性。刘备的虚伪性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現的。这大概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的，然而正是在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罗貫中的现实主义的光輝。

无疑，刘备在很多地方是表现得比較忠厚，但在忠厚之中，却又帶着虚伪的性格。他的虚伪性格并不是我們杜撰出来的，而是“三国演义”中客观存在着的。刘备少年时就有想做天子的念头，“桃园結义”也是为了“协力同心，然后可圖大事”；他标榜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声言“匡扶汉室”，也不过是他“圖王”的招牌罢了。刘备的虚伪，特別表现在取益州那几回。例如：

“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爭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銘肺腑。’于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第60回）

可見刘备不是“不忍”取益州，不过是考虑怎样取得技巧些，使人心服罢了；孔明說他得“人和”，就是这个道理。但刘备偏偏要裝成大仁大義的样子，这正是虛偽之处。他所以不接納龐統、法正杀刘璋的建議，是因为“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虽霸者亦不为也。”（第60回）至于什么“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那完全是騙人的。現在民間还流傳着“刘备借荆州，一借沒回头”、“荆州借久成己業”的諺語，用来諷刺那些失信的人；从这里我們也可以得到评价刘备性格的借鑒。

从董每戡对关羽、曹操、刘备的性格的具体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以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待这些人物的，因而，他不仅不可能給予这些人以正确的評價、不可能給讀者什么教育，并且还会把讀者引入迷津，向讀者灌輸毒素。

除了对关、曹、刘三人的性格分析以外，董每戡对“三国演义”中其他人物的分析都是有錯誤的，限于篇幅关系，我們不可能逐条論述。

上面我們說过，批評家的世界觀对于他能否正

确地評價作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董每戡之所以錯誤地对待“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正是和他長期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反右斗争中，群众揭露了董每戡的罪惡面目，董每戡不仅在鳴放时期向党向人民瘋狂进攻，而且，在解放前就長期进行着反动的勾当。他曾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出卖祖国的汉奸，又曾和文化特务張道藩勾勾搭搭，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总之，董每戡滿腦子混杂着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狗嘴里長不出象牙”，因而，他的“試論”的錯誤百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們認為：董每戡的“三国演义試論”从头到尾貫串着反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虽然他也裝出一副进步面孔，假惺惺地首先批評胡适一頓，但实际上他自己正是在偷运胡适的主觀臆断、大胆假設等资产阶级唯心观点。并且，还在今天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園地上，散發他那些沒落阶级的反动思想。因此，对他的“試論”必須加以具体的分析和徹底的批判。

1957年10月于中山大学

規模宏大的广东科学館

解放后，广东的科学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科学工作者的队伍日益壯大，科学的活动也日益頻繁。党和政府根据科学事業發展的需要和广大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为了进一步促进科学事業的繁荣，为科学工作者創造比較好的科学活动的条件，去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撥出了一百三十多万元的巨款，在广州中山紀念堂西側建成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广东科学館，这个科学館將成为华南科学活动的中心。

广东科学館是为广大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活动而建立的。这个館內設有一个綜合性的圖書室和一个寬大雅致的閱覽室。圖書室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和广东省中山圖書館集中大量重要的圖書、新旧杂志等，其中有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資本主义国家的新旧科学期刊三千多种和我国的重要古籍。这些圖書是專

供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参考用的。

科学館內有大小房間九十多个，除有关科学机关办公用的地方外，其余大部分將供广州科联所屬三十多个專門学会进行学术活动。这里有一个可容千人的大礼堂，設置有座位的桌子，以供科学家听报告时之用，还有放映电影的設置，可以放映科学影片。此外，还設有小报告室、會議室、陈列室、休息室、接待室和交誼厅等。这座科学館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創造了很好的科学活动条件，今后各种大小的学术报告、演講或會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广大科学工作者也可以在这里閱覽、休息和交誼。

此外，在科学館的天台，还裝置有苏联贈送給我国观测人造衛星用的“广角望远镜”十五架，建立有人造衛星观测台。

（顏觀輝）

事物、認識与表达

——墨家認識論的片断

杜 守 素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墨子”“經”下

“物：或伤之，然也。見之，知也。告之，使人知也。”——“墨子”“經說”下^①

这一章是墨家認識論上很重要的見解。它透露了墨家認識論是屬於唯物主义的。（“見之”，表示直接观察，和墨家重“亲知”，并以“亲知”为“聞知”和“說知”的基础相适应，是以感性認識为基础的。）

大家知道：墨子在先秦諸子中是以最先提倡“兼爱”“非攻”的學說出名的。他的所謂兼爱是爱利并提，就是“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尚賢”中篇）。更概括的口号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篇）。他的所謂“非攻”，只是反对侵略战争，并不反对防御战争。在“公輸”篇所記述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充分表现了墨子对于战争的态度。

墨子是主張“尚賢”的。他的賢者的标准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劝”与上面“疾”、“勉”同义）（“尚賢”下篇）。能够这样做，就是賢人。反之，“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朽）余財而不相分資也（“資”，与也），隱匿（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同上）就是不賢。有力助人，有財分人，有道教人——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具体的內容。

既然提倡“有道者劝以教人”，又要以兼易別，以其道易天下，普及他的學說，就必須能够善于表达自己的合于客觀真理的認識，就必須使自己的理論合于客觀的邏輯，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看起来，墨家的研精認識論和邏輯，不是偶然的。

現在回轉到本文开头的引文，說明它所包含的几点重要的意义：

第一，墨家不但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而且透

过事物的現象而認識到它的本質——“物之所以然”。（古时所謂“物”是概指“事物”說的。）墨家在“經”上，首先提出“故”而加以詳尽的分析；在“經”下开头又說到“类”。“故”和“类”这两个概念是認識結果的抽象的概括，在認識論和邏輯上都是很重要的范畴。先秦諸子中要算墨家發揮得最透徹，而其源則导自墨子。（例如，“兼爱”中篇屢言“是其故何也”；“尚同”中篇屢言“何故之以也”；又如“非攻”下篇兩者并舉說：“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

“經”上說：

“故，所得而后成也。”

“經說”上解釋道：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見之成見也。”

事物的所以然，都有它若干的“故”，每个“故”称为“小故”。合所有的“故”称为“大故”。“大故”即“物之所以然”，即事物的本質，某一事物的所以成为某事物的。所以說：“故，所得而后成也。”“魯問”篇記墨子答魯陽文君問立太子事說：

“魯君（按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所”，幫助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與”借為“譽”。）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釣者的鞠躬如也是釣事必要的姿勢，並不是為魚表示恭敬。）餌鼠以虫，非愛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志”指动机，“功”指結果，“合其志、功而觀焉”才能得其真相。可見墨子是不滿足于事物的表

① “墨子”这部書是先秦墨家學派的总集，其中“經”上下、“經說”上下和“大取”、“小取”六篇結集了墨子及他的后学的关于科学、認識論和邏輯等的見解。

面現象的。因為“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也。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也不必同。”（“小取”篇）

第二，“物之所以然”，既包含着許多“小故”，所以理想的認識，必須盡故，所以說，“辯則盡故”（荀子“正名”篇）。然而盡故，並不是容易的事，“盡”的程度，總不免有深淺多少的不同，于是乎有辯。辯就有勝負，然後真理出。“百家爭鳴”的所以能够促進學術的理論根據，就在這裡。而對於“故”有深刻研究的墨家，對於“辯”的看法，也就和“不譴是非”的莊子不同，他們認為“辯將以明是非之分”（“小取”篇）故有勝負，並指出“辯勝，當也。”（“經”上）所以說：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經”下）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經說”下）

狗、犬實同，只有大小不同（因為“狗”是“犬之小者”——見“曲禮”注）。所以說“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經”下）故謂“狗”謂“犬”，沒有什麼可辯。“牛”“馬”雖異類，但這兩名並不矛盾，“所謂”的對象或許是牛馬之外的什麼東西。這就沒有勝負可言。必須象“經說”上所說：“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牛”與“非牛”是矛盾的概念，才能分出是非，判定勝負。

由此可見，辯論之起由於認識之不同，也就是說，由於“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不必同”這個前提的。

第三，墨家不但看到人的認識不必盡如“物之所以然”，而且看到語含歧義，辭有晦澀，也可以使聽者、讀者發生誤會。就是說，“所以知之與所使人知之不必同”。所以墨經又主張在對話時，須先把對方的話語意義弄清楚，然後置答：

“通意后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經”下）

第四，“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既“不必同”，那麼，怎樣使之趨於“同”呢？在基本上屬於唯物主義的墨子，就採用

“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作為真理的標準，亦就是主張以實踐為真理的標準。現在先引關於墨子的一個故事，然後略說他的立言的“三表”法。

“子墨子曰：今瞽者曰：‘鉅（體）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者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舉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貴義”篇）

“兼愛”下篇，也云：“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又說：“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拂也。”（“費”“拂”古通用，都是僂、戾的意思。）不管是“取”是“擇”，都是拿實踐即拿行為來檢證言論的是非，作真理的標準的。這種利用矛盾對照的辯論手法，在墨子書中幾乎隨處可以看到的。下面說明墨子的“三表”法。

墨子習於工藝，主張做事都須有規矩准繩，故他在立論方面也特立所謂“三表”法，以為規矩准繩，叫做“法儀”。它在“非命”上篇被敘述得最完整，就是：

“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關於“三表”法，我曾經這樣地說明過，現在見解還沒有改變，就節錄一段在這裡，作為本文結束。——“這個立言標準，是以經驗為根據，並以事功為檢證的。換句話說，第一‘表’——所謂‘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接受古代的經驗。他說的是聖王之‘事’，不限於聖王之‘言’，也包含有過去的事功的檢證在內。第二‘表’——所謂‘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在‘非命’中篇作‘察眾耳目之情’。這就以民眾的經驗見解為依據的。第三‘表’——‘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這就是要從政治的實踐上看看是否適合於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也即是要以事功為檢證。有第二‘表’，便不易陷於個人的偏見；有第三‘表’，便可以離開經驗主義的泥坑。”（見杜國庠“先秦諸子思想概要”76、77頁）

“智”与“愚”

于燕郊

作为一种概念，“智”与“愚”，正如“善”与“恶”一样，是古今中外引起最多争论的题目。

任何概念都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理解概念的实质，必须从具体事物出发，否则就成了“概念的游戏”。而做“概念的游戏”，那是书呆子的事。

中国有一个几乎尽人皆知的寓言故事，叫做“愚公移山”。传说：北山愚公，面山而居，进进出出，深感不便，决心要“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正在“叩石垦壤”之际，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按这位智叟的想法，这是愚蠢不过的行为。可是，愚公却有不同想法：虽然山高万仞，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这个寓言，说后来愚公的行为感动了上天，果然助他把太行、王屋二山移于朔东和雍南。这自然只是寓言的作者——传说为列御寇——为肯定愚公的行为而设想的。引人深思的是寓言把那个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的人称为“愚公”而加以肯定，又把那个知难而退的急功近利的人称为“智叟”而给予否定。张处度的“故北山之愚……足以哂河曲之智”的注释，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实在是：自以为智者实愚，而被视为愚者乃智。

鲁迅先生有一篇短文，题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其反笔颇似“愚公移山”。短文里有三种人。奴才暂不置论。那个“聪明人”（即所谓“智者”）的所作所为，在“主人”或奴才的心目中，不用说是聪明之至，而对于有觉悟的被奴役的人们说来，则非打他两记耳光不可。至于那个敢于吐骂“主人”为混蛋的、“动手就砸那泥墙”的“傻子”（即所谓“愚人”），其实倒是个具有大智大慧的英雄；不是正因为有着千千万万敢于动手推翻“主人”的黑暗统治的“傻子”，才给生活在黑暗里的人们打开一个“窗洞”，打出一条解放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的道路来吗？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使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绝境转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八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一日千里的發展，震动了全世界的神话般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表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无比明智的。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是一小撮恬不知耻的、利令智昏的、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却在把共产党的领导诋毁成“外行”，把社会主义建设污蔑成“一团糟”，把共产党员丑化成“无知之徒”的同时，把自己封为“内行”，为“大知识分子”，为唯一能“收拾残局”的“智者”。

不管是“愚公移山”的寓言，还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短文，还是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其中都表明了人们对于“智”与“愚”的看法和理解上的分歧，而这一切的分歧又都围绕着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大是是大智的前提，而大非则是大愚的基础。

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划分“智”与“愚”的客观标准。大凡符合客观真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叫做大是，掌握客观真理，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物叫做智者，从政治立场来说，就是革命行为和革命人物；反之，歪曲客观真理，歪曲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叫做大非，违反客观真理，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物叫做愚者，从政治立场来说，就是反动行为和反动人物。

这里面原没有什么奥妙。毛主席就曾作过“‘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科学的阐释；连孟老夫子也说过如“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样精辟的警句。“寓言”中的“智叟”，短文中的“聪明人”，当前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管他们自封或被称为什么，他们既然毫无是非之心，也就是真正的最愚蠢的无知之徒。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广东工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资料)

金应熙

由北伐战争开始到“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从中山舰事件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就积极勾结帝国主义，向蓬勃发展中的广东工人运动进攻。北伐战争一经开始，右派为了加紧篡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其进攻更变本加厉。广东四十万工人^①面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联合威胁，仍然不稍畏怯，赤手空拳，对敌人英勇斗争和反击，历时凡九个月之久。虽然最后终于因为反动势力的强大和我方策略上的缺点和错误，到“四·一五”政变时遭遇到较严重的挫折；但是，他们已经以自己的血，在广东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时期的斗争应当作为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记取的。领导这些斗争并随后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刘尔嵩、李森等同志永垂不朽！

斗争的特点之一是广东工人运动的强大基础。从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广东工人运动即不断高涨，而由“五卅”到北伐战争前夕，发展更快。“五卅”后不到一个月，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不但促使广东全省工人组织起来，而且由于罢工工人散布全省各县，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促使全省农民迅速组织起来。而由于省港大罢工运动的开展，也使得共产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并在广大工人中建立了巨大的威信。”^②在省港罢工工人支持下，广州国民政府举行了东征及南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接着全省各城镇纷纷成立地方总工会，并进而要求全省工会的统一。为适应这个要求，共产党人主持下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于1925年12月底召开各县市工运负责人开会商谈成立全省总工会。1926年4月广州工人又成立工人代表大会（下简称工代会），从此有了坚强的统一机关。这样，广东工人成为有坚固组织的、有战斗经验的队伍；任何反动势力要想篡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都必定首

先遇到广东工人的反抗。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是从中山舰事变后才开始公开暴露其左派伪装下的反动面貌的。他们利用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弱点于1925年夏季窃取了军权和（国民）党权，但是他们自知羽毛未丰，还不敢和革命势力公开决斗。他们主要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在革命口号遮掩下由内部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他们对广东工运的破坏，也是采取这种手法，而以破坏工运的统一为主要目的。因此，广东工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工人和工贼的冲突，而实际上在工贼背后撑腰的就是国民党右派。在整个斗争中贯穿着工人运动统一抑分裂的问题，这是斗争的又一个特点。由于右派在工人中间挑拨离间，一手制造许多纠纷，致令1926年5月出现了国民党改组以来从未有过的恶劣现象——群众运动分裂。五一、五四、五七纪念日都有两个群众集会，唱对台戏，最后一次还发生冲突。原来几底于成的全省工会组织亦因此未能实现。

斗争的特点决定我们应采的策略。在北伐开始同时，中共于7月间召开了四届三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规定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在国民党内则执行扩大与联合左派、控制中间派而公开的反击右派的政策。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只有坚决反击右派而且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争取到中间力量，使敌人孤立。特别是我方力量强大而敌人采取暗中破坏的两面派

① 这数目字根据1927年6月李立三同志写的“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中的估计。另据广东省农工厅所编农工周刊第9期（1927年2月6日出版）所载，1927年1月调查，全省工会会员共五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人。因此数包括工贼把持的工会在内，故不采用。

②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广州起义”，1957年12月4日，南方日报。

手法，必須堅決拆穿其口蜜腹劍的陰謀。黨堅持這一方針，領導廣東工人對右派鬥爭會取得不少勝利。可惜當時在逐漸形成的陳獨秀右傾路線影響下，對蔣介石的反動面目認識不透，錯把他當成中派，以致不能徹底打敗反革命勢力，阻止“四·一五”反革命政變的爆發。

在北伐戰爭初期，形勢還不容許國民黨右派明目張胆地出動軍警來屠殺工人。他們一方面還未完成準備，另一方面在北伐中還要利用工农的力量。因此，他們只能利用許多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軍隊開赴前方的機會，盡力限制工人運動。在一切為了北伐勝利的借口下，他們要求工人無條件服從剝削階級。7月16日廣東宣布進入戰時狀態；所有產業、貿易和一切社會團體的活動都被置於軍事當局直接控制之下。兵工廠、水廠、電廠和粵漢路工人不得舉行罷工。8月7日，右派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名義公布禁止工人持械遊行和尋仇鬥毆。這個表面上要“鞏固後方治安”“以大局為重”的命令實質上是要片面解除工人的防衛，使工人們在工賊流氓的屠刀下無反抗的力量。8月16日，國民政府又發布解決雇主雇工爭執仲裁會條例和勞工仲裁會條例，規定“國民政府所視為公平或所修改之判決，即為最後之判決。”當時右派在國民政府中占著優勢，所以這些條例的實質就是把爭執的判決權放在右派手中。

從7月到9月，共產黨領導工人們進行了反限制的鬥爭。首先他們勇敢起來反擊工賊的進扑，因為工賊乃是執行國民黨右派限制工運法令的鷹犬。當時廣東總工會、機器工會等工賊組織到處橫行，工賊流氓殺害工人的事件，在廣州和省內各地陸續發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陳森事件。陳森是廣東總工會理事長，一向專事搜羅所有東家組織的偽工會和工人對抗。7月13日，他唆使其爪牙在惠福路殺害牙利抵抗工人二名，引起全市工人的憤慨。在工代會召開一百七十個工會的代表進行請願得不到切實答复後，憤怒的工人自己行動起來，於7月18日拘捕了陳森送公安局究辦。到此，在幕後支持陳森的國民黨右派馬上出來給他撐腰，蔣介石親自寫信給公安局長將陳森放走。幾天後憤怒的工人們第二次請願，蔣只寫一張“命公安局將陳森隨傳隨到”的條子，來欺騙工人。在蔣介石庇護下，廣東總工會就大胆拒絕參加工人部組織的陳森案特別委員會。面對著囂張的敵人，廣州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團結起來，展開肅清工賊運動。工代會拿陳森罪惡的鐵的證據來教育廣大工人。當工人們看到從陳森

把持著的茶居工會搜出來許多殺人凶器，還有陳森和商團反革命頭子陳廉伯的密信時，連平素受陳森蒙蔽的工友們都止不住心頭的憤怒。於是根據確鑿的罪証又逮捕了陳森的八個黨羽。對歪曲報道陳森案經過、為工賊張目的“現象報”，工人們也給予制裁。印刷工人、郵務工人和報販等一致響應全國總工會抵制反革命書刊的號召，迫使該報不得不從7月23日起停版，直到9月該報向工人低頭認罪，登報道歉後，才能復版。廣東各地工人也紛紛起來響應廣州工人，驅逐廣東總工會系統下的工賊。如汕頭工人驅逐了公開詆毀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反動派張凌雲；惠州工人和廣東總工會惠州支部的工賊黃淑蘭展開鬥爭，由於工人們提出了黃淑蘭勾結陳炯明、楊坤如和魚肉工人、破壞工運的確實證據，使當地軍政當局不得不將黃淑蘭解省懲辦。

其次，工人向國民黨右派支援資本家和工賊的行政機構——廣東省農工廳進行了鬥爭。右派分子劉紀文於7月15日就任農工廳長後，便支持工賊和民團分頭在城鄉向工农進攻。他故意留難真正工會的立案，縱容屬下人員勒索。單在廣州市，就有洋務總工會、潔淨工會等革命工會五十個以上被抑壓得不到批准，以致會務停頓。相反，劉却不依工會條例，批准華強工會（東家工會）立案，製造華強工會和土洋雜貨店員工會的糾紛。廣大工农群眾對劉紀文的行為異常憤怒。羅綺園、劉爾嵩等先後揭露和駁斥他的反動言行。到10月，國民黨右派為掩飾其罪行，不得不讓劉紀文去職，由陳孚木繼任。

這一時期的形勢有利於工人鬥爭的開展。國民革命軍已飲馬長江，兩湖工運風起雲湧。上海工人經過六、七、八三個月罷工加強了反帝反封建的組織力量，正準備投入更大的鬥爭。在華南，為了爭取更有利的形勢，省港罷工委員會已於10月10日自動結束了罷工，但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仍然存在，而且不顧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陰謀破壞，屹立著成為華南工人鬥爭的堅強堡壘。國內革命形勢和工運的高漲大大地鼓舞了廣東工人的鬥爭。另一方面，廣東工人此時的迫切經濟要求，也推動他們起來英勇戰鬥。七八年來廣東物價不斷上漲。1926年的米價已比1919年上升一倍。但工資除部分產業工人經過艱苦鬥爭有較大提高外，大部分工人（主要是手工業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六小時，月中所得低的不過三元，最高的也不過二十元，確實無法維持家計。而且在資本家關廠威脅下，失業工人日日增多，工人們都有加薪、減時、保障工作的要求。在這些有利條件下，加上革命工運工作者的積極領

导，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右派虽极力限制，也无济于事。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11月广州工人罢工斗争达三十五次^①。其中如火柴工人、米业工人、手车夫等罢工都是牵涉几千人的大规模斗争，在工代会领导下粉碎资本家的顽抗，取得了胜利。

通过艰苦的斗争，广东工人在组织上更加强固了。从4月到10月，加入广州工代会的工会由一百五十多个增加到二百多个，会员由十三万人增加到十九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人。其余汕头、惠阳、新会……各地工会组织都壮大了。过去散漫不统一的工会也统一起来，形成了强大的产业总工会。在这方面，铁路工人是显著的例子。1926年4月前广三、广九、粤汉三路工人还没有密切的联系，广九工人本身的组织也陷于分裂。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成立后，在杨殷同志等领导下，三路工人密切联合起来了。他们组织铁路交通队支援北伐，支援省港罢工工人，还在援助被压迫工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组织了一次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击。依照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吴玉章同志等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10月15日到28日）。会议中讨论了提高党权、实行民主、反对独裁等问题，对蒋介石的党羽张静江、叶楚傖展开了斗争^②。会议通过了有关工人运动的十项议决案，对工作时间、劳动条件、劳动保护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又明确提出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第一项）；修正工会法，改善工会的组织，免除工会间的冲突（第二项）；设立劳资仲裁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的冲突，务求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这些项目如能切实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工运的阴谋将是很大的打击。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运工作者，曾为执行这十项议决案、达成广东工人大团结而斗争。11月初广州工代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半年来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号召工人进一步团结起来，拥护国民党联席会议关于工人运动的议决案，并展开反对东家工会、驱除工贼运动。11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劝告广东工人团结的信，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才能对敌，但单靠一部分团结力量还是不够的，要不分界限的大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死亡”。接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东省农民协会、香港总工会等也相继呼吁广东工人团结。海员工会和香港总工会引证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事实，证明非行动起来、团结一致，不能制

敌人的死命。广东农协则希望广东整个的工人力量和整个的农民力量联合起来，为国民革命的利益而奋斗到底！

这时刚遇到发生兵工厂停工事件，工人从实际教训中更感到团结的重要。石井兵工厂工人有一千七百多人，本属于机器工会。10月底兵工厂当局忽以整理厂务为名，宣布停工，其目的是要改行工兵制及包件制度，以加强对工人的专制统治。工人即进行反抗。并上书全国总工会请求援助。于是广州工代会召开总代表会议决定支援兵工厂工友复工，于11月15日举行各工会代表大请愿。海员工会及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亦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乃决定成立委员会商讨解决办法。工代会代表在委员会中依据兵工厂工人所提供的事实，驳斥了兵工厂当局所谓军火减产由于工人怠工的污蔑，指出真正原因是设备简陋和管理不善。由于工人代表的力争，当局不得不默许恢复原状，且承认该厂工人于1925年6月讨平刘杨一役中所争得的条件，继续有效。工人遂得胜利复工。在11月21日的欢送工人复工大会上，工代会刘尔嵩同志指出，这次胜利不但对兵工厂而且对各交通公共机关工人都有重大意义。过去反动派专挑拨工人恶感，这次工代会与兵工厂工人通力合作，就可打破其挑拨，希望今后由一时的团结进而为永久的团结。

综合说来，由1926年7月到11月，由陈森事件到兵工厂停工事件，广东工人在党领导下对右派斗争还是坚决的，取得了不少胜利。这正是所以能争取到中间力量，使全省工人大团结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原因。但是，12月初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随之而暴露出来的我方策略的失误，却使局势的发展逆转。12月是整个斗争的转折点。

如所周知，从11月蒋介石进抵南昌后，蒋和武汉方面革命势力的矛盾已经逐步表面化。这个卖国贼就更急于卖身投靠，派出戴季陶等去和帝国主义勾搭。帝国主义者为了收买这个代理人，这时也就加紧布置“政治南伐”的阴谋。为了向帝国主义者作进门的赞敬，蒋介石及其党羽积极准备在东南各省发动

① 据余啓中編：“广州劳资爭議底分析1923—1933”內統計表算出。此書內容不完備，这三个月罢工实不止此数。

② 1926年10月份“广州英文日报”司綏廷、林干合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簡史”，記述联席會議在九月，誤。司、林二君系据吳玉章同志追述。吳老或一時誤記，或筆記紀錄之誤。

反革命政变。当时蒋介石在广东所依靠的，就是和他密切勾結的桂系軍閥。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武汉后，在广州成立的中央政治會議分会，主席就由桂系軍閥担任。控制分会的国民党右派深知要进行反革命政变，單靠軍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須努力在一切社会階層中，組織力量来反对共产党和革命工农。为此，从12月到1927年4月右派分別在組織上、思想上積極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因受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綫的影响，又缺乏必要的階級斗争經驗，就不能及时向工农群众揭露右派的陰謀和組織他們向右派反击。

右派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把国民党省、市党部牢牢抓在手里。右派深知国民党作为革命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对当时人民群众是有威信的，是塊可以利用的招牌。1926年12月底广东省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二届省党部时，右派就采取了先选执委四十五名而由政治分会圈定其中十五名的办法，以确保右派在省党部的多数。結果本已被大会选出的刘尔嵩（得一百三十八票）罗綺園（得一百三十六票，都是中共黨員）兩同志被无理排除，而补上还得不到五十票的徐天深等右派分子^①。广州市党部的选举中右派也运用了同样的卑鄙手段。广州市的国民党員群众首先是工人黨員起来反对这种不民主的做法，但是当时中共广东組織却执行了陈独秀的右傾路綫，为要爭取桂系軍閥的中立而放弃力爭国民党省党部改組問題。結果，右派遂得从容把部分左派的反对压制下去。

右派的另一步驟是繼續利用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中的工賊，分裂工人运动，煽动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工人去屠杀工友，借此逐步积蓄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力量。为了打消兵工厂停工事件后兵工厂工人对統一工会运动的期望，反动派就喊使兵工厂內工賊張添等誣指主張和工代会团結的工友四十九人为“不良分子”，开除工会会籍，并拘往机器工会。12月份起，工人間的糾紛又見增多，都是由工賊压迫工人而起，到1927年元旦，便發生軒然大波的机器工会武裝进攻鉄路工会事件。

事件起因，由于机器工会企圖分裂鉄路工会，煽誘粵汉路机器部工人七十余人加入机器工会。机器工会并以“惡人先告狀”的方法，去函农工厅質問粵汉路工会，以武力威胁。粵汉路工会理直气壯地駁复了机器工会的上訴，引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議案，指出不能讓職業別組合淆乱了产业組織原則。其实机器工会的指責不过是大举进攻的借口。1927年1月2日晨，机器工会中的反动头

子糾集强徒二百余人，用步槍、手榴彈扑攻黃沙粵汉路工会宿舍；次日上午又向石圍塘广三路工会进攻。兩鉄路工会損失很大。鉄路工人英勇应战，又得石圍塘农民的幫助，終於兩次都把敌人击退。

这次事件實質上乃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預演。現于反动軍警于事件發生前后和机器工会强徒密切配合，供应新式軍火，和强徒进攻对象选定了广州工人中組織最堅固、在一次武裝斗争中作用最大的鉄路工人，都可明显看到：事件是有計劃布置的，絕非偶然。而共产党和革命工会未能对反动派进攻馬上組織有力的揭發与反击，这就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政治分会狐狸狐掘，又議決解决办法六項。表面上是公平处理，規定双方嗣后不得寻仇斗毆。但是机器工会明目張胆地举行进攻而毫不受到惩处，反而規定“机器工会會員服务于各鉄路者，鉄路工会不得强迫其退出机器工会。”这就使机器工会达到了侵入鉄路工会的目的。鉄路工会竟然接受这样的办法，說明了工人已經在右派的压迫下步步退讓。

形势發展到这个地步，全省工人大团結当然无从实现。1927年1月广州工代会提出召集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并进一步成立全省总工会，但在政治分会的压制和工賊的破坏下这計劃胎死腹中。

我方的退讓使国民党右派在和我們爭取城市中、小資產階級中占了上風。他們从各方面誣蔑和謾罵共产党人和革命工运工作者，說我們“分裂”“搗乱”“破坏社会秩序”。1926年12月，广东省政府布告禁止工人“持械游行”“擅自拘人”“擅自封鎖商店”。与此同时，右派即展开宣傳攻势，鼓吹由于工人的經濟要求已經超过維持产业的范围，广东工業已到了不安的时期，因此工人运动違反国民革命的利益，政府不能不加以限制，借此爭取广东小厂主和店东的支持。到农历年关前后，右派又挑动了关于年初二解雇工人問題的爭执，进一步煽动工商糾紛。右派玩弄兩面派的方法，一方面批准实業厅的呈文“商人視夏历正月初二去留店員权之有无为商店生死关头所系，不可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对請愿工会代表說可以考虑修改，暗中則挑撥广州市四个商民团体集合万余人亦举行請愿，提出和工人代表完全对立的主張，这样来扩大事

① 原来选出的四十五人名單，見“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会日刊”第8期。圈定的名單見“中央政治會議广州分会月报”第一期。刘尔嵩、罗綺園都是省党部第一届执委。

态。結果年关前后被解雇的工人达五千人。在右派操縱下工商糾紛好久不能解决。

国民党右派一方面磨拳擦掌，暗中准备屠杀工农，可是表面上却假裝保护劳工。1927年2月，右派头子們还畢恭畢敬地迎接来华参加太平洋劳动會議路过广州的国际劳工代表团，大談其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結；直到4月初，反革命政变已如箭在弦上，而政治分会的代表还到广州工代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去做报告，保証执行孙中山的农工政策。中共广东省組織并没有能够及时向群众揭穿这些騙局，也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动员起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当时在广州有革命工会会员近二十万人，有槍械的自衛队千名以上，必要时可以得到市郊农民的协助。但是这些力量都没有应战的准备。甚至在工人代表会上黄埔軍校学生的代表声称他們不愿为蔣

介石等奔走而愿为革命利益奋斗时，也没有得到党的任何号召和指示。因此，革命群众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来时处于比較无准备的状态。4月15日清晨，桂系軍閥派兵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积极分子，解除黄埔軍校和省港罢工工人糾察队的武装。二千名铁路工人被驅逐了，以机器工会的走狗来代替。工人領袖刘尔嵩、李森、何耀全等都被捕牺牲。革命力量没有馬上統一还击的准备，只有糾察队和铁路工人对政府軍隊作了几小时的斗争。由于我們疏于戒备，敌人在广东順利地杀了第一刀。这一慘痛的教訓我們應該永远記取！

虽然遭遇到严重的打击，广东工人是絕不会放弃斗争的，他們慢慢重新集积力量，进行反抗白色恐怖的斗争，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中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在筹备成立，这是广东科学事業的又一个新的发展。

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綜合性研究所，它將密切結合华南地区的特点和需要而进行研究工作。該所現設有历史研究室、經濟研究室、哲学研究組和民族研究組。在历史方面，研究重点是对近代史和現代史的研究，并在可能条件下，將逐漸發展对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和东南亞历史的研究。在經濟方面，重点是对华侨及港澳經濟問題的研究，同时进行对广东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問題的研究，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对广东农业經濟

問題的研究。在民族問題方面，主要研究华南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以及台灣的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經濟和社会制度問題，以广东海南島的黎族和連南的瑶族为重点，解决各民族和东南亞各族的源系問題，解决如何發展各少数民族地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等問題。在哲学方面，以研究康有为、梁啟超、孙中山等广东籍的著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为主。

这个研究所是去年开始筹备的，現在仍在積極筹建中。現已有研究工作人員四十人，圖書四万多册。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收集和整理有关的研究資料，并重点进行調查和研究。

(顏觀輝)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

編者按：“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灣地区的斗争”这个调查报告，是在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門支持下，由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發起，联合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中山大学历史系、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省文化局組成的“广东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調查工作組”写成的。这个工作組于1957年2月間出發到湛江市（旧称广州灣）和遂溪县进行了調查，在当地党委和文教部門的协助下，訪問了斗争参加者的抗法老人，勘察了抗法斗争遗迹，并搜集到一些实物和文献資料。

我們發表这个調查报告，主要是提供一些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情况和材料，反映这个工作組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初步看法；希望能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注意，繼續發掘这一方面的史料和对这一十九世紀末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 广州灣的形势与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

广州灣原为我国南部雷州半島南端海灣的名称，在清代，屬高州府轄境，海面綿亘数十里，东界高州府屬吳川县之麻斜，北界雷州府屬遂溪县之海头，在这兩处，清代均設置了营汛与炮台，其南海距离硃洲島四十里，“一嶼孤悬，形势大为扼要”^①。广州灣又为我国南海一深水不冻良港，較大的船只与艦队均可灣泊，从广州灣到越南的海防，印度的加尔加答，以及南洋群島等处，都很便捷，欧洲来的船只，到达中国，此为最近的港口，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广州灣在軍事上和商業上作为我国南部一个重要海港的地位。

十九世紀末叶，世界資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这，显然是和分割世界斗争尖銳化的事实联系着的。在亞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冲突，表现为企圖瓜分中国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

因为清政权的腐朽与卖国贼李鸿章的投降政策，我国在中日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挫敗，割地、賠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也加深了国内的

阶级矛盾。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胜利，使远东国际形势起了相应的变化。国际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的权益，彼此間矛盾，亦日形尖銳；因此，在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力量在中国的部署，有了新的分化与組合，而这一尖銳的斗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求得在中国問題上获取均势的斗争，是相互勾結又相互排斥，严重地損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奴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分贓活动，因此它必然不能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容忍，而奋起进行反对“瓜分”，反对奴役的正义斗争。在割地狂潮时期，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爱国活动，包括資产阶级改良派的“百日維新”运动和孙中山先生1895年在广州的起义，以及全国人民反清的起义，和反教会的斗争，都不断燃燒着人民反抗的火焰；如1895年，山东曹州單县大刀会的“灭洋”起义，同年，青海、甘肃回族人民举行大規模的反清起义。1898年四川余栋臣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扶清灭洋”相号召，声势尤为浩大。在安徽渦陽，有刘疙瘩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兩广，1897年有广东遂溪、石城三点会众刘芝草所领导的起义；1898年广西玉林、南宁一带李立亭的反清起义，連清政府也承認兩广“会匪猖獗”，“剿不胜剿”。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除了大举外債，作为对日战争賠款外，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37，第1頁。

并在国内加强搜括，1898年發行所謂“昭信股票”作为搜括的工具，一方面又公开卖官鬻爵，助長貪官污吏对于人民的压榨，而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則过着極端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样的国内政治形势，說明了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人民无法活下去了，广大人民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对封建統治者的卖国投降政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連續不断的斗争。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占据沿海港口作为侵略我国的根据地同时，彼此互認势力范围，長城以北屬俄；揚子江流域屬英；山东屬德；云南兩广屬法（一部分屬英）；福建屬日。又各爭鐵路建筑权，英得二千八百哩，俄得一千五百三十哩，德得七百二十哩，比得六百五十哩，法得四百二十哩，美得三百二十哩；而这些侵略行为，是通过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結，互相默認，而后强迫清政府承認的。其中法帝国主义对于西南各省的侵略，早具野心，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帝为了巩固其在越南的統治，更加速其对西南各省侵略的步伐。在俄、德、法三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島之后，他們紛紛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在1895年5月，法国政府就向清政府提出这一問題，法国駐華公使施阿蘭在北京大肆活动，一再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允訂中越界約和商約，他露骨地說：“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調处，大有益于中国，而法都議院屢詰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訂此約，俾閩國紳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①。而且施阿蘭每次談判时，都拟好了草案原文，不許更易一字，在法帝胁迫下，清政府与法国簽訂中法界約和商約。（1896年中法界务專条附章五条，1895年中法商务專条附章九条。）通过这两个約章的簽訂，法帝攫得了云南边境的猛得、烏得兩地，进一步威胁西南各省的安全，它还攫得了在云南、广西兩省通商、減稅等特权，更重要的是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境内的开矿的优先权和鐵路建筑权。这样，法帝不仅控制了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并且可以进窺四川，插足于揚子江流域，与英帝国主义爭衡，而在兩广方面，他进一步想攫得一海口，作为出海的通道。这样，便在中国南部海岸求得一“停船躉煤”的借口下，向广州灣伸出了侵略的魔手。

法帝国主义垂涎于广州灣这一中国南方的良港，已非一日，早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辛巳）7月，法船“安非特理德”号二次来华，曾因台风，避風于广州灣，船員登岸逗留了一个时期，当时見

广州灣地形險要，港灣优良，便測探水道和繪画地圖，归国时献于法政府，引起了法帝国主义覬覦这一良港的野心。从1897年以后，法帝国主义經常派軍艦在广州灣一帶巡弋，进行其“測量形势，繪画水道”的陰謀活动，作为其准备武装占領的根据。法帝国主义企圖占領广州灣，不仅因为其自然条件的优越，而且也为侵略者战略要求所决定，因为法帝如果占据了广州灣，則“內可以扼省、港之門戶，外可以联越南之声援，且可窺伺琼、廉、瓊、断矿利”^②。那就是說，法帝占据广州灣，就可与英帝所占有的香港对峙，保持平衡的局面；一方面可以在中国南海占一門戶，可以控制海南島与雷州半島，作为向兩广內地侵略的跳板，因此，法帝进占广州灣，不是簡單地“停船躉煤”的問題，而是建立侵略中国南方各省的根据地的問題，它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为了保衛祖國的領土和主权而进行反对侵略的英勇斗争。

具有光榮的反侵略斗争傳統的广东人民，早在中法战争期中，就曾对法帝国主义侵略祖國的权益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劳动人民，对法国的侵略战争，表示極大的憤慨。1884年9月間，香港的工人，就曾举行过反法斗争。在同一时期，广东的潮州、揭陽、佛山、廉州、北海、海口等处，都曾进行过反教会斗争，并把进行間諜活动的教士驅逐出境。这些，都是在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之前，广东各地人民对法帝侵略行为所进行的反击。

法帝国主义在进占广州灣之前，曾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1897年2月13日，法国公使施阿蘭至总理衙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把广西龙州的鐵路，展至百色；又須在中越云南边界，筑一鐵路至昆明，更要求海南島与广东沿海不讓与他国“躉煤”。在法帝国主义的威迫下，清政府接受了法国的要求。3月15日，正式照会法国公使施阿蘭，承認不把海南島讓与其他国家。并于同年6月12日与施阿蘭互换照会，議訂了四条：（1）承認把龙州鐵路展至南宁和百色；（2）承認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优先权；（3）承認改善中越边境的水陆交通；（4）承認在滇越交界处，筑一鐵路至昆明。通过这些条款的簽訂，法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广西內地，加强了对云南、广西等省的控制。因此，在德帝国主义强占膠州灣后不久，法帝国主义亦在南方进行其蓄意已久的侵占海港的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14，第1頁。

② 王国强：“遂溪、湛江人民抗法斗争史料”，第1頁。

活动。

1898年3月7日，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训令驻华代办吕班，向中国政府提出四项无理要求：（1）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应照长江之例，不得让与他国；（2）中国邮政总管令法员补充；（3）由越南往云南省城修筑铁路；（4）南省海面设立趸船之所。这四项要求，由吕班于3月11日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予以承认。清政府令驻法公使庆常，向法外部婉辞拒绝，而法外长哈诺德回答庆常说“吕班所开四事，系援案（指援英德已得到的利益——引者），必须照准”。又说“如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另筹办法。”^①又称法议院请派舰重办等语，这些威胁性的词句，庆常电告了清政府，而吕班又连至总理衙门催办，“限以时日”，“势将决裂”^②。事实上，法帝在提出要求的同时，它的海军已在南海窥伺，法国的勒索威迫的行动，并得到帝俄的支持，清政府向其他列强呼吁，亦得不到反应。形势在3月底4月初趋于紧张，清政府终于在1898年4月4日，承认了法帝的要求，并在4月4日，4月9日，4月10日，双方互换了照会，承认下列各条款：

（1）清政府承认，紧邻越南的中国各省（按：指云南、广东、广西三省）领土不割让或租借其他国家。

（2）正式同意由越南边界，经法国政府或其指定公司，筑一铁路至云南省城，中国政府供给沿路所需土地。

（3）同意租借广州湾与法国，租期九十九年，租价四至另议。

（4）中国邮局现由海关办理，将来成立邮政总局，如请外员，照法国之意办理。

吕班于4月11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报告，承认谈判的进行是艰巨的，并且说让与沿铁路线的土地这一条，在中国政府，还是第一次。在中法双方交换照会不久，划界事尚未正式派定专员之前，法帝国主义海军，于4月22日（阴历三月初二日）在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领下，在广州湾东南部强行武装登陆；声称“在一个被放弃的炮台，树立了法旗”^③，而实际是在遂溪县属的海头村登陆，并强迫占领了海头汛炮台。广州湾从此沦于法帝国主义的魔手。

二 抗法斗争前广东遂溪县的社会历史情况

遂溪县唐以前属合浦郡，隋开皇十年（590年）

置铁杷县，即今遂溪县治。唐天宝二年（743年）始改铁杷县为遂溪县，属雷州。元、明、清三代，俱仍旧名，原属雷州路，明清两代属雷州府^④。遂溪县与海康（雷州府治）、石城（今廉江）、吴川三县接壤，东南面临大海。由广州湾进口水道四十里至海头港，为遂溪沿海要塞，设有防守营汛，有海头炮台与对岸吴川县属麻斜炮台相对峙，形势极为险要，清代在海头炮台，设有千总武官防守，属雷州参将营管辖。外海有硃洲、东海两岛，为广州湾的门户，“一属高州，一属雷州，孤悬海中，乃高、廉、欽、雷、琼五郡出入必由之道”，在海防上极为扼要。由海头入内二十五里至赤坎埠，赤坎为遂溪县属一大商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务繁盛，“每年销货价值千余万，海关榷税三四万”^⑤。出口以油、麸、糖为大宗，进口以火水、匹头、洋纱为大宗，为雷州半岛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遂溪县在中国民族斗争的历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南宋末年，中国人民反对蒙古的侵略，民族英雄张世杰，曾在雷州府属一带^⑥与敌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宋帝赵昺，曾即位于硃洲岛，并曾改硃洲为翔龙县，其后始迁于新会的崖山。明末，南明大将李定国在1654年亦曾与清军在高雷一带进行过战斗。高、雷府属遂溪、吴川各县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反抗外族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受过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因此在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时，很多老人，就回忆起过去前辈的记述——蒙古侵略时，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做亡国奴的惨痛，而奋起与侵略者进行斗争，可见历史上民族斗争的传统对于广大人民深刻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秘密结社三点会的组织，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间，亦具有广泛的影响和雄厚的潜在力量。因为清政权的腐朽，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加深，广大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重重压迫，曾进行着不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这，亦加速了秘密结社的发展。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广东各地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由天地会领导的。凌十八、何明科、陈金缸等的起义，在高雷一带，曾进行过广泛的活动，因此遂溪县属三点会的活动，有其悠久的历史，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遂溪人民抗法斗争之前，

①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31，第6—7页。

③ 法国外交文件（1894—1898）第67号文件。

④ “道光遂溪县志”卷2，第3页。

⑤ 李鍾旺：“遂良存照”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28页。

亦極為活躍，根據清实录的記載：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95，3，18），兩廣總督李瀚章奏：“遷瑯客民，拜會放飄，拿獲首伙，訊明懲辦，并拿獲海康、遂溪、石城等縣立堂‘會匪’。”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1897，6，27），諭軍機大臣等：譚鍾麟、許振祿奏：——“石城、遂溪兩縣，三點‘會匪’借復仇為名，竟敢嘯聚多人，搶掠軍械，張貼偽示，杀伤台局各勇，……業經正法一百四十三名，唯匪首劉芝草及著名各匪，尚多在逃。……粵東寇盜充斥，‘會匪’名目繁多，地方官防范稍疏，即虞蠢動”。

遂溪縣秘密結社三點會組織在抗法鬥爭前的基本情況，從抗法時遂溪縣知事李鍾珪給清政府的報告可以說明：“查高、廉、雷屬三點會由來已久，歷經查辦，終未能盡絕根株，稍一疏虞，即暗長潛滋，蔓延至不可收拾，遂邑東連吳川，北接石城，西界合浦，拜會之風，漸染頗深。……凡入會者曰做三點，不入會者曰做百姓，以一縣計之，大約三點有四成，百姓尚有六成，然亦迭為消長”^①。可見其潛勢力的巨大。這些勞動人民的組織，在平時進行對封建統治者的鬥爭，而在外國侵略者侵入我國領土時，他們就奮起進行英勇的搏鬥。這一情形，不僅我們在訪問時所得到的材料，証實三點會眾，為抗法武裝的主力，而且鬥爭亦為他們所策動；即在李鍾珪的文告中，亦明白承認這一點，他在嚴禁謠言告示中說：“近因界務未定，人心不安，各路‘會匪’，聚眾拜會，聲言欲與洋人為難。”^②可見反對侵略者，首先是勞動人民中間的三點會組織。

遂溪縣在抗法鬥爭前，社會經濟並不發達。因為地土比較貧瘠，出產以雜糧為主，一般人民都很窮，而且土地集中情況亦甚嚴重，根據我們在抗法鬥爭基地之一黃略村所作的調查，抗法前，全村有五、六千人，多數為窮人，無田無地，有錢的叫大百姓，最多的收一千二百石租，有三四架牛車，（按：遂溪鄉間，皆以牛車作為交通運輸工具，車輪很高大。抗法戰爭，曾用作掩護物。）種五十幾萬種（相當於五百畝地）。窮人則靠做長工生活，或先向地主、富農借債維持生活，然後做工抵還，或將兒女作押。婦女則靠織布為生。這些都是當時社會階級關係的基本情況。因為土地貧瘠的關係，就是在極嚴重的地租剝削情況下，也還有很多窮人，得不到土地耕種，這樣在农村中，形成了為數不少的游民無產者，有一部分人以賭為生，遂溪

花會白鴿票賭之風很盛，有一部分人被生活所迫為“賊”。另一方面鄉紳地主所組織的“公局”（保良局、安良局等），具有無上威權，作為對勞動人民壓迫的工具，农村中的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而這些游民無產者，又大都組織在秘密結社內，因此，有組織的反對封建統治壓迫的鬥爭，在高、雷屬各縣，甚為普遍，雖然此起彼伏，但人民却因此得到了鍛煉，當外侮之來，更易挺身而出。

遂溪雖然是一小縣（1848年人口為274,272人），但人民具有反侵略鬥爭的歷史傳統，同時在廣大勞動人民中間，存在着帶有革命性的堅強組織的三點會，並且在封建剝削壓迫下貧富懸殊，階級矛盾亦很尖銳，抗法前曾經有多次的起義。在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後，不僅帶來政治上的壓迫，同時也帶來經濟上的奴役，因此，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是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

三 法軍登陸後的暴行與初期“劃界”的鬥爭

法帝國主義者的海軍，在1898年4月22日在海頭登陸占領炮台後，曾舉行所謂“慶祝儀式”，鳴放禮炮，表示侵略者的“勝利”，并向法國海軍部提出了報告^③。登陸前後，未與中國官方取得任何聯繫，并陸續增兵，建立兵營，擴大武裝占領，繼續向內地進窺，企圖造成既成事實，在未劃界之先，迫使清政府承認。因此，從1898年4月至10月，是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灣已經取得立足點，逐步擴大其侵略陰謀的時期。法軍一面擴大武裝占領，向內地深入；一面嚷着要求劃界，說地方官員與廣大人民阻止劃界，但當清政府派員等候劃界時，又避而不見，有意延宕，推諉責任。總的目的，是擴大侵占地區，向內地深入，并不以得一廣州灣為滿足；如果不是廣大人民起來抗爭的話，法帝侵占的地區，

① 李鍾珪：“遂良存贖”——“稟陳地方情形”抄本第8頁。

② 引見同上，第42頁。

③ 法國外交文件（1894—1898）第67號。又法帝占領廣州灣後，曾于西營建立了第一次占領廣州灣的戰艦“白雅號”的紀念碑。見王國強：“湛江、遂溪人民抗法鬥爭史料”，第1頁，打印本。

決不限于广州灣一地，而事實證明，法軍在最初時期，就想把吳川、遂溪兩縣的大部分地區加以占領的。

关于法軍在广州灣登陸地點，文獻資料與口碑傳說，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法軍先在吳川縣屬之麻斜登岸（即東營），占領了炮台，然後才向對岸的海頭墟擴展，占領了下山埠（即西營）。另一說是法軍先在西營登岸，占領炮台，建立營房，然後再向東營發展。根據中、法官方的文獻，証實法軍是先占領海頭汛炮台，然後向內地進犯。法國海軍給海軍部的報告，和遂溪抗法鬥爭領導人之一李鍾珪的調查，都是如此。我們在訪問座談所得到的材料，也證明最初反抗法人的侵略的，是赤坎外圍南柳村、海頭港等地的居民，那就說明法軍最初進占地區是海頭汛炮台與下山埠（西營），而後才向對岸麻斜擴展，並且在1898年10月，占領蘭洲島的炮台，巩固了广州灣外圍的據點。

法軍在海頭、下山埠一帶，建立營房，不斷向內地窺伺，由于法軍的侵略行為，引起當地人民的憤怒，自動起來，準備武器，對敵人進行鬥爭。當時這種自發的鬥爭，還缺乏組織領導，又沒有新式武器，只是些鋤頭、大刀和藤牌、木棍等。從1898年6月到10月，海頭、南柳各村的人民，曾對侵略者，進行了三次的襲擊：

第一次是1898年6月19日（舊曆五月一日），南柳、海頭港、下山、菴塘、洪屋等村居民五百餘人，在當地居民吳邦澤、吳大隆、吳邦華的率領下，手持木棍、大刀、粉槍、戈矛等武器，襲擊法軍。因為缺乏作戰的經驗，加以武器的落后，抗法隊伍犧牲了三十多人，殺死法軍二人。

經過這次襲擊後，法軍更肆無忌憚地在南柳村一帶，強姦婦女，搶掠財物，並且瘋狂地進攻南柳村，南柳村群眾二百多人，1898年7月29日^①在南柳、沙灣一帶進行英勇的抵抗，雖然因武器不敌，犧牲了八人而向後撤退，但亦堅持了三、四小時之久。

在1898年8月25日的前幾天，海頭村的人民，又組織了一次對法軍炮壘的進攻，根據法方的報告，這次進攻，“是以速射槍武裝着的”^②。

由于這幾次對法軍的襲擊，大大提高了人民抗敵的信心，法軍再不敢象過去那樣肆無忌憚地進行白晝搶劫和奸淫，他們龜縮在炮台之內，少數人外出，就會遭到襲擊。海頭墟農民，就會用鋤頭打死過法兵^③。因此法兵不敢出來自由行動，他們一方面設法增加兵力，準備進一步對中國人民進行屠殺，一

方面又向清政府施行壓力，說由于中國人民的敵意，“始終阻勘租界，法提督欲自彈壓”。一方面又把挑畔的責任，誣指為我方，準備作為進攻的借口，同時指責中國人民的抵抗侵略，是由于兩廣總督的支持，準備要挾清政府，以親法的官員，來進行划界的“談判”，以達到掠奪我國土地與主權的侵略野心。

事實上，當時賣國的清政府，是听命于帝國主義的。當遂溪海頭村人民，進行反侵略鬥爭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致電兩廣總督譚鍾麟，唯恐粵西人民對法占炮台事進行反抗，囑其“安撫”粵民，等到7月29日法兵屠殺我海頭村居民，清政府電令駐法公使慶常，要他向法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懲凶、賠償，而法国外交部長的答復，反說中國弄錯了事實；命令駐華公使畢盛，要求中國政府保證法軍“和平享用租借地”，否則他們就要“自行準備警衛”^④。

关于划界問題，在1898年4月交換照會，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灣之後，就派定當時督辦欽防候補道潘培楷為广州灣划界專員，這事，法駐華公使畢盛亦在1898年6月6日，報告了法国外交部。至少說明清政府在出賣國家主權方面，是有“誠意”的。但是潘培楷奉命後，到赤坎等了二十多天，仍未見法方代表到來。“潘培楷在彼久候，迄無會晤之期，迄因公回欽（州），法官乘輪忽至，及往再約，又回海防，有意耽延，其心叵測”^⑤。兩廣總督譚鍾麟，給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報告指出：“勘界一事，陽為催促之詞，實則陰蓄異謀，為逐漸侵占之地。”^⑥事實也正是這樣，划界談判，不過是一種幌子，在法帝一方面用武裝侵占，一方面在划界問題耍手段的時候，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又根據法國海軍的意見，起草“关于广州灣的協定草案”，並將這草案于1898年5月27日送交了總理衙門。法国外交部長亦

① 王國強：“湛江、遂溪人民抗法鬥爭史料”，打字本，第3頁。原件只說是陰曆的六月，根據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4號，法国外交部長致駐華公使的電報，知道這是7月29日的事，是陰曆的六月十一日。

②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6號。

③ 粵西行署文教處：“戊戌抗法調查材料”抄本第2頁，1955年2月。

④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4號。

⑤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37，第1—3頁。

不断地在訓令中，指示畢盛，划界問題，要“依照軍事当局的指示所准备的划界条款”^①。这就很显然的看出，所謂划界問題，只是法軍准备軍事占領的借口。根据法方所提出的这一草案，除了囊括 蘭洲、东海兩大島外，“吳川、遂溪兩县，均須割去其半，所謂租借地縱橫數百里”^②。这决不是什么“停船躉煤”的租借地，而是对我国領土的占領，这不仅为当地广大人民所不能容忍，即稍具良心的地方官吏，亦認為“五郡之众（高、雷、廉、欽、瓊五府）未必心服，亦未聞有跨海而立租界者，此乃不可行者”^③。划界的斗争，將成为广大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导火綫；在1898年底，法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暴行，更使这一反抗运动，由醞釀而趋于成熟。

必須指出：从1898年9月到1899年2月，这一时期在租借广州灣和反抗法国侵略者的問題上，情形比較混乱。在統治階層清政府的內部，地方和朝廷，存在着分歧的意見，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承認了法帝租借广州灣的要求，但究竟租借多少地方，怎样划界，他們是从未考虑的。在法帝采取了主动，首先占領广州灣的海头，同时当地人民又自發地起来进行斗争，清政府才感觉情形不妙，所以初期对法帝还提出了一些表面的抗議，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方官吏的見解。当时兩广总督譚鍾麟，对于法帝不知照地方官而强迫占地，并且伤害人命，是有意見的，認為租一“停船躉煤之所”，不須要这么多的土地，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民的意見，他給总理衙門的报告，是主張对法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且要求撤兵，縮小划界的。同时他亦看出“万一积怨不遏，聚众滋事，戕害法人，衅端立啓”的危險，因此他也不主張“抑民助法”。所以他的意見，不为侵略者所容，認為他支持人民，“阻撓划界”。要求清政府予以譴責^④。在清政府遭受法方重大的政治压力时，統治者內部的矛盾必然扩大，而这种矛盾的扩大，則是当时遂溪人民抗法运动的有利条件。因为地方官吏在不同意清廷的政策和受到法帝譴責的情况下，会默認以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人民抗法运动的發展的。

在法国侵略者这一方面，他們除在划界問題上有意延宕外，并积极准备軍事占領。在1898年9月，占領了广州灣外圍的蘭洲島，將操場上的演武厅拆毀、炮台上炮位拆除，运往淡水和广州灣。在同一时期，法帝对海头附近各抗法乡村，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1898年10月，焚毀了南柳村，并以武力

胁迫海头附近二十七村庄，“出具甘結”，不与法人为难^⑤。欲用暴力的方法，懾服人們抗敌的意志。当时法兵逐步深入內地，到处插旗測繪，又逾赤坎而上，至吳川县屬之門头埠，居民人心惶惶，究不知法兵侵占至何地为止。

当时遂溪县知事熊某，“貪污腐敗，屈膝投敌”^⑥，更激起人民的憤怒，紛紛要求撤換这一腐敗的官僚；地方的紳士，因为自己的祖宗坟墓被挖掘，土地被占領，亦激起了敌愾。遂溪麻章紳士馮紹琮^⑦，乃至省城呼吁保存乡土，并要求撤換知县熊某，另委干才，广东巡撫鹿傳霖，答应了馮紹琮的要求，另委李鍾珏为遂溪县知事^⑧，并密諭他們举办团練，准备抗敌。这样，遂溪人民的抗法运动，在李鍾珏到任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 遂溪人民的奋起与抗法武装組織的形成

在法帝侵略逐步向內地深入时，激起了遂溪各

①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13号。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39，第3頁。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37，第3頁。

④ 法国外交文件（1898—1899）第11号与第15号。

⑤ 李鍾珏，“遂良存贖”——“稟陈赤坎地方未便开埠通商”，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29頁。

⑥ 王国强，“湛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史料”，打印本第7頁。

⑦ 馮紹琮，遂溪县麻章村人，一字昆珊，候补知州，曾在馮子材部下，随赴越南參战，遂溪抗法时家居，办理团練，任团总，为抗法武装主要领导人之一。过去調查資料，把馮紹琮与馮昆珊（又作坤山），誤为二人，此次調查，得到馮紹琮遺物，解决了这一問題，并从李鍾珏的“且頑老人七十自叙”証实他为抗法武装总的負責人。

⑧ 李鍾珏字平書，江苏上海人，优貢生，朝考以知县分發广东，曾任陆丰、新宁、遂溪三县知事。遂溪人民抗法时，曾積極起而领导斗争，予人民以良好的印象，并因参加抗法而被撤职。1911年曾参加上海起义，任民政总長及江苏民政司長，后为国會議員。他关于遂溪抗法斗争的記載，有“遂溪刺稿”（抄本）“遂良存贖”（抄本）与“且頑老人七十自叙”（刻本），因系亲身参与斗争，所記经过，比較翔实可信。

地人民的憤怒，南柳村人民對敵的鬥爭，鼓舞了各地的人民，特別是三點會眾，就秘密集議，準備起義，反抗法人的侵略。但當時力量分散，尚未形成領導中心。在另一方面，地主富農階級中人，因為法軍的侵略，自己祖墳被挖，土地被占，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侵略的意志。為了控制廣大群眾憤激的情緒，防止廣大人民的起義，更非把群眾納入一定的組織形式不可。同時為了保衛統治階級的利益，也非暫時採取與人民一致的態度不可。這正是當時清廷地方官府與紳士對人民的抗法鬥爭所持的基本態度。因此在群眾積極要求之下，地方士紳在縣官李鍾珪的支持下，出面組織團練。當時有“富人出錢，窮人出命”的口號。官、紳、民在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可是，廣大人民與統治階級仍然有不同的立場：在廣大勞動人民方面，是仇恨法帝國主義的無理侵略，為了保衛民族家園，他們挺身而出，不計利害地與敵人進行鬥爭；地主與富農只為了保衛自己財產，也想抗法，但本身沒有力量，必須倚靠群眾，同時也害怕群眾，因此他們的抗法，是被迫的、動搖的。馮紹琮在他自敘履歷中，曾經指出，法人的侵略行為，“團勇皆願誓死與爭，迫得挑選成營，歸其統帶”^①，可見他如果不出來領導，群眾會自己起來的。李鍾珪到任後，雖然積極舉辦團練，但他自己也說，是為了“約束紳民，不准自我開衅”^②。但無論如何，抗法武裝組織建立起來了，並且有了新式武器的毛瑟槍，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人民的自衛力量，並有可能給來犯的敵人以迎頭痛擊。因此我們認為，對於李鍾珪、馮紹琮等支持人民抗法的行動，應予以正確的估計。特別是李鍾珪，在積極支持人民抗法這一點上，至今仍為當地參加抗法老人所贊揚，留下很好的口碑。

廣東藩司在1899年1月12日發表李鍾珪代理遂溪縣事，他在2月4日到赤坎，7日至遂溪接事。這時正是陰曆春節，2月11日他即赴赤坎，召集福建、潮州、廣州、高州、雷州五會館董事商人，探詢地方情形，並籌辦團練的事，他並親赴法兵占據的海頭地方，察看形勢，他認為赤坎已在敵人的掌握之中^③。而敵人侵占的野心，必將逐步擴大。在另一方面，他考察了地方的情形，認為三點會的潛力非常巨大，全县人民有百分之四十，參加了拜會，這是一個嚴重的“隱患”。他也看出“法人貪欲無饜，得步進步”，與“百姓寧死不服法人之心，紛紛爭議抵禦”。“法人如果強索內地村墟，百姓勢必力拒”^④。“他日兵連禍結，恐三點‘會匪’

乘之起事，下四府（按：指高、廉、雷、瓊四府）各州縣，有不堪設想之虞。”^⑤基於對內外形勢這樣的估計，加上在廣州臨行時，譚鍾麟、鹿傳霖對他的“團練不可不辦，但當严守界限，彼不來不可生衅，彼若來犯，當竭力抵禦”的指示，他認為辦團練為至切至要之圖。所以他到遂溪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集中力量，領導辦團練，既可以控制群眾要求抗法的憤激之情，也可作萬一抵抗的準備，同時地方士紳和群眾也有組織起來的要求，因此抗法武裝組織就在這樣情況下逐步形成，並在統治階級中有一定抗法情緒的上層人物支持下，得到比較健全的發展。

李鍾珪在組織抗法武裝團練的工作上，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如籌募經費，制定規章，召募人員，選拔領導，購辦軍火，加強訓練各方面，他都做了準備，並逐步付諸實施。“家資滿萬者，各捐錢三百千文，多者遞增，少者遞減，各大姓祖堂，亦同此例。”^⑥“并限諭到十日先題捐簿，然後分三期收銀”^⑦。因為當時各階層人民反抗法國侵略的義憤和決心，很快就籌集四萬兩銀子^⑧，派員赴廣州善後局購買了“前膛抬槍五百杆，單响毛瑟二百杆，‘士乃打’槍三百杆，藥彈每槍五百。”有了武器，就選拔壯丁，開始組織訓練工作。

根據文獻紀錄和我們調查訪問的材料，當時成立的抗法武裝的六個營^⑨，其設置地點為：黃略、麻章、文車、平石、仲伙、志滿等六個村。其中黃略、麻章為大村，成為重要的據點。每營練勇二百

① 馮紹琮：自書“履歷”，原件抄本。

② 李鍾珪：“遂良存贖”——“密稟團練情形”抄本第65頁。

③ 李鍾珪：“遂良存贖”——“稟陳赤坎地方未便開埠通商”，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28頁。

④ 李鍾珪：“遂良存贖”——“上欽差蘇軍門說帖”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4期第32頁。

⑤ 李鍾珪：“且頑老人七十自敘”第243頁。

⑥ 李鍾珪：“遂良存贖”——“勸募團練經費諭”，抄本第47—48頁。

⑦ 李鍾珪：“且頑老人七十自敘”第243頁。

⑧ 李鍾珪：“遂溪剩稿”油印本第10頁。

⑨ 李鍾珪：“遂良存贖”——“密稟團練情形”，抄本第65頁。根據幾次訪問材料，各村團練基層組織叫做營，李鍾珪所寫的材料名之曰團。而他在另一材料，也叫做營，把全县團練總的領導人，叫做團總，則各村的組織，以訪問材料叫做營為恰當。

五十人，共一千五百人，这是受过正式訓練的队伍。根据李鍾珪所記^①，則每营有团丁二百五十人，練勇二百五十人，共五百人，不过团丁是指一般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壯丁，也可以說是后备队伍，因此六个营的練勇，虽然只有一千五百人，而实际的队伍則有三千人。当时，这六个营的团練組織，主要为防禦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在同一时期，李鍾珪在西海地区，亦开办团練，計楊箐，楊柑，北坡，界炮，乐民紀家各一团，每团編制仍分为五个哨，每哨練勇五十人，共練一千二百五十人。其他規制一如黃略各团。这說明了抗法时期，遂溪县各乡，举办团練的普遍。

当时抗法武裝組織中，每一个成員，都有统一的服裝，“每人有一条鑲紅边的藍色褂仔（背心），胸前背后又鑲有白色的圓圈，圈内印有紅色字，胸前是‘义’字，背后是‘勇’字。每人又發一个竹笠”^②。每一个参加組織的成員，每月都有餉銀，哨官每月是五千文（据說每千文当时相当于一元），什長三千三百錢，义勇月俸三千錢，薪餉来源是各村人粟捐及按米粮、牛車派捐。在城的义勇，每逢訓練时期，每天發給一百四十文至一百文作为伙食費用。

关于参加义勇队伍的成分，根据訪問紀錄：“充当义勇的都是穷人，只有哨官才是富有的武秀才或武童生充任”。另外根据参加座談的黃略村紳士、公局長^③王緝堂的乡亲所談的情况，亦可以知道参加者主要都是穷人。当年参加抗法义勇的王春源（八十九岁，抗法时什長）、王进（八十二岁，义勇）二人的回忆說：

“王緝堂問大家，是不是要打它（指法帝）！大家說，一定要打。王緝堂又問，敢不敢打？大家說，敢打。大家問王緝堂，有錢人肯不肯出錢？王緝堂說，穷人不要命，如果穷人家敢打，有錢人就出錢。故当时有‘穷人有（不）要命，富人不要錢’的說法。”

可見当时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全部为村中穷人，只有較高的領導人物如哨長之类，才有武秀才、武童生一类人参加。关于参加群众与三点会的关系問題，虽然李鍾珪在选拔义勇时，有这样一条規定：“拜会为‘匪’，和吸食洋烟者不送”。事实上这是一条具文。吸食鴉片者，体魄不强，自然不能参加訓練。但拜会問題，李鍾珪亦明知遂溪人民百分之四十参加拜会，而三点会又規定有錢人不能参加，那么三点会实际上是穷人的組織，而参加抗法武裝的义勇，又都是穷人，那就不可能沒有三点会

众参加了。根据我們訪問参加抗法的老人和各村的前輩，証实訪問的各村，几乎都有三点会組織，而参加抗法的老人，多半是参加过三点会的。石磠村抗法老人李賢华（八十三岁）提供了一个材料：說抗法时，三点会开会，多半是談打法国鬼事。这就說明了参加抗法的基本群众是三点会中人。而且在策动抗法斗争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虽然1897年遂溪和石城（今廉江）三点会刘芝草的起义被統治者殘酷的鎮压下去了，但这并不等于統治者已經遏止三点会的發展。李鍾珪一到遂溪，就注意到三点会問題，正說明了当时三点会活躍的情况。在抗法时期，他唯一恐惧的，就是三点会可能爆發大規模的起义。这也說明了三点会在广大劳动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些穷苦的劳动人民，是坚决抵抗外族侵略的中心骨干，他們“一意拒敌，誓死不从”，迫得統治階級中不得不起而領導斗争，抗法斗争在麻章、黃略二村的主要領導者馮紹琮与王緝堂，在他們自述和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被迫情緒，正足說明这个問題。也正是因为抗法义勇的基本群众，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是三点会中人，他們才能“声气聯絡、心志固結”，連李鍾珪也認為：“練丁俱能用命，每月会操兩次，各紳齊集議事，人心頗固”。又說“目前地利人和，似尚可操勝算。”因此才能在抗法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关于抗法武裝的总的領導人問題，除了李鍾珪是以地方官身份，直接主持組織領導外，地方士紳馮紹琮与王緝堂是比較突出的中心人物。因为黃略村是大村，法帝几次进攻的矛头，都針對着黃略，而黃略村在抗法斗争中曾一度被占，牺牲很重。因此，黃略村成为抗法斗争的中心地帶。而作为黃略村的“公局長”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王緝堂，在抗法时被群众推动而組織抗法义勇，同时亦被李鍾珪指定参加全县团練保甲总局，因此在訪問材料中，群众認為他是抗法义勇总領導人；但我們考查了历史文献，根据王緝堂的社会地位，和他在抗法中的表現，我們認為他并不是抗法武裝組織的总領導人，而只是黃略村抗法义勇組織者之一，他在抗

① 李鍾珪，“遂良存牘”——“办理西海团練示”抄本第57—58頁。

② 史学会广州分会訪問紀錄，第11頁，油印本。

③ 公局長是各村管理的機構，是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其职权相当于乡長。

法中，并未参加实际领导工作^①。实际上在抗法过程中，王緝堂是动摇的^②。抗法后因为东海岛财产关系，又与法帝有勾结。同时在李鍾珪亲身所记载的几种材料，除了团練保甲总局有他名字外，未再提过有关他的事；如果他是抗法武装总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在他的文件中反映出来。

另一方面。李鍾珪在他自叙中所說辦理团練的經過時曾說過：“挑选精壯一千五百名，分各乡訓練，諭麻章紳士馮紹琮为团总。馮紳曾隶广西馮子材軍門麾下，軍事頗有經驗。”^③和馮紹琮自己在履歷中所說：“二十五年（按指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法人借租高州府屬广州灣，竟又越占雷州府屬麻章、烏蛇嶺、万年桥，包割数百村，是时团勇皆愿誓死与爭，迫得挑选成营，归卑职（馮氏在履歷中自称）統帶，朝夕訓練，擇要防守。”^④的事實相符合。同时馮氏是在籍的候補知县，曾立有五品軍功。根据訪問紀錄，1898年底去广州謁見广东巡撫鹿傳霖要求撤換遂溪县前知县熊某的是他，同时要求上面補助軍火，組織抗法的也是他，随后他又派武举馮卿云秘密去广州請領軍火，同时他由广州回来，就積極从事組織活动，馮紹琮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不是王緝堂所能比拟。在另一方面，他又参与过馮子材部下，在越南作过战。这些条件，都使他有資格成为抗法御侮的总的领导人。在抗法事结束后，他因为受到法人的怀恨，被迫随苏元春避至龙州，这些都可以說明李鍾珪在文件中所提到的事实是比較可靠的。

当时团練的編制，采用营官、哨長、什長等名称，是清末新軍的一般編制，因此，从其編制來說，亦帶有半官方性質。根据訪問的材料，李鍾珪对于各村各营，派有專人負責訓練工作，每营二人至四人不等，在黃略村这一营，并有軍需和軍医等名称。李鍾珪并亲至各村檢閱操練，甚至亲自教人放槍，并經常对練勇講話，鼓励士气，練勇朝夕出操，巡邏放哨，非常辛苦，在这样严格的教練下，短期內成为一支可以作战的人民武装。抗法老人回忆說：过去看見法国鬼有些怕，等到自己武装起来，就不怕了^⑤。更重要的是，通过抗法武装組織的形成，各村人民空前团结起来，过去文車乡和黃

略村曾因小的嫌怨，引起械斗，但現在講起打法国鬼，大家都一致，一齐出动。本村中各哨亦很团结，这样在抗法的总目标下，各村人民自动地团结起来，因此才能收到杀敌致胜的效果。

关于各村营官哨官的领导人，訪問所得的材料，不很一致，大致可以确定的是：黃略村营官：王蘭卿（一說王緝堂）；哨官：王明卿，王喜卿（武秀才），王鳳高（武童生），王开平（武童生），王炳章（武童生），王景运。平石村营官：郑拾；哨官：郑伯栋（即郑子詩），郑清吉，郑章印，李良田（石盤乡人）。麻章村营官：馮紹琮；哨官：馮步云，梁四兴，謝龙年（其余未詳）。文車村营官：楊秀湘（武举人）；哨官：楊秀桐（武秀才）（其余未詳）。仲伙村营官：黎培新（武举人）；哨官未詳。志滿营（全部未詳）。另黃略营軍需：王保全；軍医：馮鶴年。

李鍾珪于1899年2月到遂溪，3月开始办团練，4月正式开始訓練，經過四个月，到8月（旧历七月）各村义勇一千多人，在黃略村赤泥嶺举行歃血誓师大会，群众抗敌的情緒空前高漲，人人飲了血酒，表示誓死杀敌的决心。提出“不打法鬼，就要做亡国奴！”“保卫家乡，就要打法国鬼”的口号。并且在赤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表示了遂溪人民不可屈服的坚强意志。从此以后，随着中法划界談判的發展，展开了反对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

（下期續完）

① 王緝堂是黃略村公局（安良局）長，抗法时黃略营官是王蘭卿。

② 1899年11月，法軍攻陷黃略时，王緝堂事先逃跑去廉江，后来經李鍾珪命令他回来收拾善后，他才回来，見王保全所写“黃略村抗法退回三十里”一文。

③ 李鍾珪：“且頑老人七十自叙”，第243頁。1922年上海印本。

④ 馮紹琮：自書“履歷”，原件傳抄本。

⑤ 史学会广州分会調查紀錄，第5頁，油印本。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發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理 論 与 实 踐

月 刊

1958年第1期(总第1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1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州印刷厂

發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